

省市领导对我市史志工作 作出重要批示

3月31日，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批示：“峰海书记、术平市长：首先向您表示敬意，临沂市在你们的领导下，大力弘扬沂蒙精神，集中实施“八大战略”，全力打好“六场硬仗”，开创了科学跨越发展新局面，令人鼓舞。同时，你们高度重视史志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在朱海涛同志的带领下，临沂史志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走在了全省前列。全省优秀史志成果评比又取得第一，可喜可贺。望临沂史志办继续加大第二轮修志、综合年鉴编纂和方志馆建设的力度，确保实现“三个全面”。恳请二位领导继续关心支持史志事业发展。衷心感谢！”

4月6日，临沂市委书记林峰海批示：“感谢爱军主任对我市史志工作及总体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临沂史志工作的成绩是省史志办支持帮助的结果，是全市史志工作者勤奋工作、积极进取的结果。史志工作是记录历史、弘扬正气、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正处在内强外拓、发力赶超，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美新临沂，与全省同步提前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史志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认清形势，立足实际，服务大局，努力开创史志工作的新局面，为发掘优秀历史文化，发扬沂蒙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市人民精神文化水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月5日，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批示：“临沂史志工作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各项工作并驾齐驱，成果丰硕。望在新的一年里，紧扣“三个全面”，取得更大成就，走在全省前列。”

4月6日，临沂市副市长赵爱华批示：“近年来，临沂史志办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创新工作方法，积极主动作为，各项业务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受到省史志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赞扬。我为全市史志人深感自豪骄傲！祝贺你们、感谢你们！请将三位领导人批示精神在全市史志系统迅速传达并抓好贯彻落实。请以海涛同志为班长的市史志办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更加团结、务实、创新的精神状态，凝聚推动工作新动能，站在新起点，再创新辉煌！”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赵 强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刘振本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高 华 04

【峥嵘岁月】

红色传奇：我的抗战 苗得雨 08

西朱范村的“爱民井” 王宗富 13

铁军大帐追歌行（一）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6

【名人素描】

秦士文：为全忠与孝，除夕送家堂 王 建 25

王俭解选 杨 赛 29

【文化掇英】

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 余光煜 34

【史海撷萃】

从沂蒙起家的赤眉军 Zhangliang9137 40

从原始材料看张灵甫被击毙细节 张国新 44

【探索发现】

画说于腾（中） 高 雷 46

抗战旧址之一——莒南大店 本 编 51

【蒙山沂水】

虚丘城遗址 平 凡 53

【史料辑存】

王小古年谱（续） 刘瑞轩 55

【诗画赏析】

抗战歌曲选——《辞别老婆去当兵》 本 编 61

【影像沂蒙】

沂河桥的故事（上） 本 编 63

【文史论坛】

曾子卒年考辨 李洪廷 65

【文明之星】

赵志全：新时代企业家的楷模
符 丹 叶 勇 陈海芸 67

【沂蒙名医】

低调女高音
——记赵海燕 刘凤才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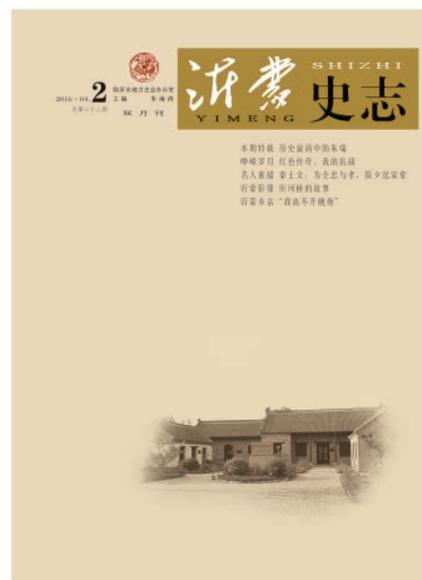
【沂蒙乡亲】

“我离不开舰炮”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志明 余华梁 黄 华 75

【史志动态】

封面：莒南大店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详见本期《抗战旧址之一——莒南大店》）

封底：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议兵》 /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高 华



朱瑞与夫人潘彩琴

对于朱瑞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是很陌生了，人们或许只记得，这位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是在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役攻打义县的战斗中触雷牺牲的，而对于他的其他活动则知之甚少。但是，在当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朱瑞同志”却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早年留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院，长征中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的朱瑞，1939年6月，奉命随徐向前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39年的山东局面与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似，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的力量相比，中共在山东的力量还较弱小，朱瑞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好在毛泽东已为全党制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抓武装、夺地盘。

然而，落实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手中必须有军队，尤其是久经战火考验的主力部队，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入鲁的时间较晚。1938年春，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在延安当面向毛泽东请求派红军干部入鲁，以整训、壮大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毛泽东同意了黎玉的请求。红军将领张经武率一批长征干部

随黎玉返回山东，不久就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徐向前、朱瑞进入鲁南后，即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总部给其的权限是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而在这年的3月，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的一个主力团与师部机关已陆续进入鲁西。

这样，中共在山东就有了两支军队：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抗战新局面随之打开。革命在大步前进，行进中的步伐凌乱就被掩盖了，八路军总部规定的山东纵队统辖山东及苏北中共武装的命令被无形取消。原由朱瑞担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在1940年被撤销番号，改由山东纵队指挥所属部队。1940年6月，徐向前奉召返回延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予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模糊性，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日寇频繁进攻根据地，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趋于激烈。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山东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



陈士榘、罗荣桓、黎玉、赵搏、朱瑞、萧华在鲁南

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山东阶段的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也有不成熟的方面——身上还保留一些书生气。朱瑞善于作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9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二年的时间。

来延安的高级领导同志，虽然都在学习，情况却各不相同。刘伯承就曾一度被停发文件，不被通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后经周恩来援手，刘伯承的境况才有所改善。陈毅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境遇亦向好的方面发展，1944年春、夏，被通知参加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事活动。然而，朱瑞没有得到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机会，他长期处在“学习”状态，颇为引人注目。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在这篇《自传》中，他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朱瑞的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会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朱瑞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被党内同志所认识——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



朱瑞被贬谪与罗荣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时期发生。客观事实证明，在朱与罗的争论中，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当然，朱瑞在党内地位的下降，还源于各种复杂微妙因素的综合作用。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在某些偏激者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一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赶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渴望再赴战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被任命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抗战期间，受客观的游击战争性质的限制，延安炮校局促于延安远郊，长期进行训练、生产。在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炮校的多数同志因知识分子出身而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把炮校恢复，继而赶赴东北战场，这实非易事。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成为林彪麾下的炮兵司令员，且还不是直接带兵之人（当年，在干部心理上，都向往直接带兵，对技术兵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朱瑞的领导下，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三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渴望战斗而不耐在人事关系复杂的上层机关搞一些地图作业，这或许是朱瑞不愿留在延安总部的原因，而放手让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个时代任人唯贤，不以一时偏失定终身的一种优良作风吧。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担一切磨难，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此所谓革命的“炼狱”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宗旨，舍小我为大局，个人荣辱皆可全部抛开。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捷报中，朱瑞触雷阵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成。幸耶，不幸耶？

是年，朱瑞43岁。



开国元帅和将军子女到哈尔滨烈士陵园祭奠朱瑞将军

红色传奇：我的抗战

苗得雨



苗得雨 1932年3月5日生，山东省沂南县人。12岁开始文学创作，曾被延安《解放日报》誉为解放区的“孩子诗人”。

1946年参加工作，历任区通讯站副站长，鲁中南报社和大众日报社主办的《农村大众》通联、编辑、记者，山东省文联和华东文联创作员，《前哨》和《山东文学》副主编，省作协负责人，省文联、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副书记。

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早苗得雨》《青春辞》《沂蒙春》《解放区少年的歌》《苗得雨六十年诗选》等，论文集《文谈诗话》《赏诗谈艺》《探艺集》，另有《苗得雨散文集》（一、二、三、四集），剧本《保卫大翻身》等41种。诗作《早苗得雨》选入《抗战名作百篇》。

今年（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以去年为准，也是我创作70周年。抗战时，直接写抗战；抗战后，写对抗战的回忆；近七八年来，又进而写对抗战的研究。70年，写作没停，“抗战”也没停。

直接写抗战，开始有剧本《参军》《家庭会》《儿童割草捉特务》等；有练习写带曲谱的歌曲一批。这些，因为当时不知往哪投稿，都没有发出来。给报社投稿后，除了新闻通讯，主要是诗歌小调，许多都陆续发表了。“陈老三，是孬种，为了一块饼，甘心卖祖宗！”（《陈老三》）“鬼子汉奸没人心，逼粮催款猛似虎，揭去大锅还不算，小绳拴了奶奶去，一家大小哭成泥，鬼子汉奸笑嘻嘻，得雨跺脚暗发誓：‘长大报仇扒你的皮！’”（《早苗得雨》）“老财东进门算盘响，汉奸狗进门尽管抢，‘我要你磨眼里生出蒿蒿草，我要你锅底结下蜘蛛网，剩你一粒粮，算我眼珠长腿上！’”（《汉奸狗进门》）“鬼子完了蛋，汉奸一绳拴，摆下大会场，黑压一大片，有苦就诉苦，有冤就申冤，如今不说话，过后别嫌晚！”（《反奸诉苦》）

回忆抗战，或者说，抗战已成为一种题材，常常直接写到或间接涉及到。诗《沂蒙山好》，涉及到抗战；诗《革命老人赞》（写“革命母亲”于大娘），直接写抗战；诗《铁肩》《石磨的歌》《沂蒙山颂》《铁雷区》，都侧重写抗战；长诗《怀念》（写“山东刘胡兰”解文卿的故事），涉及抗战；小长诗《三个亲人》，写对在战斗中牺牲的三个八路军战士的怀念，直接写抗战——抗战中故事；散文《儿童团站岗放哨》《抗日小学的老师们》《识字班大姐们》《来鬼子和鬼子完蛋》《哪棵青松是你》《打蒙阴城战役和〈打蒙城小调〉》《学模会》，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写抗战。

在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那段，写了一些评述性文章，《山东解放区文艺特点忆述》《忆战时农村剧团》《抗战诗歌再品赏》《田间的鼓声仍在响》《读巍巍》等，或广泛或就某个方面研究、评论抗战文艺，重点是诗歌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战斗性和艺术上的久远意义。

1973年、1974年，我在“文革”中受批判，被打倒，刚“解放”不

久，就连续几年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采访了大量抗战故事，当时和以后陆续写了一批重要纪实文学，包括《金维三智斗》（写民兵英雄金维三故事）、《“铁雷司令”炸鬼子》（写民兵英雄高运成故事）、《追击》（写劳动英雄王兑一在打鬼子当中是“爆炸大王”故事）、《“沂蒙山西大门纪事”》（写兴旺庄全村抗战）、《“红嫂”的寻找》《“沂蒙山妈妈”的述说》（三题，“红嫂”式人物故事）等。刘知侠写的小说《红嫂》，是根据李子超（曾在沂南工作，后任省委领导）提供的真实故事，但那位媳妇不让宣传，知侠才虚构一个叫“红嫂”的人物。沂南乡亲说，“红嫂”式人物很多，最典型的是横河李家林一个女哑巴，我特意去访问了，那女哑巴叫明德英，是李开田的妻子，事迹很突出，我写了《“红嫂”的发现》，在《山东党史》发表，后来她成了“红嫂”的代表人物。

新世纪以来写的回忆文中有一篇较有深度，这就是《从沂蒙山到滨海——罗荣桓和一一五师艰苦战斗纪略》，基本上写了山东抗战史，文中涉及一些有名的战斗：留田突围（希伯写的《无声的战斗》那段故事），山东纵队马牧池突围，大青山突围，绿云山战斗……罗荣桓率师部一部分警卫人员在临沂北面过的敌人封锁线，是用奇智从鬼子眼皮子底下通过的，是这样从沂蒙山转移到了滨海，故事情节是新近采访中挖掘到的，是从来没有人写到过的，史料价值十分宝贵。我在沂蒙山，从沂南到沂水，到沂源，到蒙阴，到莒南，采访的故事还有好多，没有都写出，我连同采访本，都提供给写小说的儿子长水，他后来写的不少东西，就是从那儿来。

2010年1月7日，我写《说起当年打鬼子》一文，2012年7月4日，我又写《智者知也——再说当年打鬼子》一文，是对抗战的研究，讲鬼子是怎么被我们打败的。第一文，从陈诚说起，陈诚在回忆录中，对抗战有这样的说法：“如说日本是被我们打垮了的，不如说日本是被拖垮的……”我分析发现，日本鬼子的特点是占地盘，地盘占了以后，留兵力守着，我们中国之大，它有多少兵力去占、去守？当1938年底，它占了武汉、广州以后，感到兵力已不够用，不能再继续进攻，便停止了正面进攻，转为“扫荡”后方，也就是主要对付抗日根据地，而方法也是一边“扫荡”，一边安据点，也是把兵力都用于占地盘。它兵力越分散，我们便越有力地去打它。根据地中心安不进据点，好歹安上个，很快就被拔了。我们在不断拔据点当中，根据地在扩大，我们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像山东，当打了沂水、莒县，打了蒙阴，几块根据地便连成了一片，我们开始反攻，最后打败鬼子了。总之，鬼子在中国的失败，就在于占地盘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内战，也是占地盘，走鬼子的老路。开始，毛主席和他谈判时说：“我们打不过你，但我们可以用对付鬼子的办法对付你。”这就预示着我们照样打败他。这番研究，在第二文时，通过学习毛主席1938年5月写的《论持久战》一文，就更明确。毛主席说：“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希望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这就告诉我们，日本必败，我们必胜。毛主席又为战争划了三个阶段：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有了第一个阶段，就有第二个阶段，有了第二个阶段，就有第三个阶段。我们的胜利是这样一步步来的。这两番研究表明了，日本失败者若再来打，且不说难有这种可能，就是有，也照样必败无疑。

有一年，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我曾说：抗战作家，怎么能做到一直写到现在，我说，我做到了。就是这样做的。从沂蒙山到滨海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政军领导中心在沂南，约三年多。1941年底至1942年初移向滨海的临沭与莒南，三

年半。罗荣桓和一一五师在沂南，住的时间较久的地方是留田一带。前一段，省旅游局负责人丁再献，陪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去留田附近一个村庄看过罗帅当年办公的地方；我的老大长水，也于不久前陪济南军区一位老领导去留田察看，准备在那里建“一一五师留田突围纪念馆”。一一五师移滨海后，住临沭时间不长，住时间较长的是莒南十字路附近的东、西良店。我老岳父当年常说起他们民兵守卫一些老首长的故事，那时他是民兵队长，后任支部书记。老伴至今还能说清谁谁住在谁家。1944年，大店经过“查减”斗争，斗倒了伪区长兼伪镇长庄英甫和恶霸地主庄景楼等人，那一带环境安定了，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机关移到附近村庄。1945年8月省战工会更名省政府后，都一齐移到大店村内，直到鬼子投降后的9月去临沂。

日本鬼子从1939年起，就重点“扫荡”沂蒙山，其中1941年和1942年为最凶。1941年，是侵华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指挥五万多人，对沂蒙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1942年，是侵华日军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二至三万人，搞“拉网扫荡”。这两次“扫荡”，都十分残酷，我们的损失也大。1942年是沂蒙山根据地最困难时期。还剩“东西一条线，南北十里宽”，被形容为“一枪能打透”那样一点地方。1943年，开始好转。经两年，就大反攻了。一曲《烈火燃烧在沂蒙山上》，就是唱的那段岁月。

1941年11月3日夜，蒙阴的鬼子400余人，不走村庄走野坡，长途偷袭马牧池山东纵队司令部，半道上被兴旺庄民兵发现了。民兵以为全是汉奸，挡住打了三个小时，鬼子以为遇上了蒙山支队，也认真地和民兵打。此时住这村的山纵通讯员公茂和急去司令部报了信，鬼子蒙蒙亮包围时，司令部人员已基本转移出去。只是到了第一个集合点西北的归山，遇上了鬼子埋伏，当改向东北黄山子第二个集合点，又遇上了鬼子的埋伏。损失都在两个集合点上，然后一直突围向了西南蒙山附近。第二天的11月5日夜，几股鬼子包围向留田一一五师驻地。罗荣桓在驻地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事不宜迟，今夜一定突围出去。向哪突？向北，那里是国民党地盘，刚发生过摩擦；向西？那里敌人已有了里三层外三层；向东？敌人估计我们会突围向滨海，是他们的重点防守地带。向南突，向鲁南，那里是敌人的后方，兵力空虚，倒可能是安全地带。决定了，便率师部机关与部队2000余人，悄悄过汶河，沿河边山角，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一枪未放，一人未失，突到了费东县的汪沟一带。在那里住了一段，月底决定一部分精兵打回根据地，不让包围留田扑空的敌人久久摧残百姓。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领一部分精兵，去打绿云山，拔除刚安在那里的据点。师机关人员与山东分局及抗大一分校等，转移向大青山。罗帅嘱咐他们要向大青山以东，在临蒙公路两边，看见西有敌人往东去，东有敌人向西回，我们打绿云山的回来正好接应。他们派人探好大青山里边没有敌人，便向了山里。不料敌人正埋伏在那里。他们接着向西南突围，又恰是敌人重兵所在。这次突围损失大，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刚写过报道留田突围成功的《无声的战斗》的国际友人希伯，以及姊妹剧团团长辛锐等，就是在那次突围中牺牲的。罗荣桓与全部突围出去的人员，在天宝山一带停了停，便决定一齐转向滨海。要越过沂、沭两道河和临沂到沂水、临沂到莒县两条公路，大家一批批走。罗帅是一个骑兵班护送。我采访了曾给罗帅当过勤务员的王汇川老友。汇川说，罗帅他们这一拨，在走到临沂北面的时候，望见东面远处来了大股敌人。他们连忙换上缴获的鬼子服装，有两件呢子大衣，罗荣桓穿上了一件。然后从容地向西，又往南，再往东，绕过了大股敌人。敌人远远望见他们，没有异样反映，可能以为自己人，各有各的任务，各走各的路。罗帅他们就这样从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安全地通过了。一一五师和山东党政军机关移到滨海。

1942年那次鬼子“扫荡”沂蒙山，头目冈村宁次鬼点子多，让特务机关在济南

放风说，将“扫荡滨海”，这情况被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获知。敌人又二次放风，情报又二次传到滨海。住甲子山附近的山东地方党政领导，领大队人马转移向沂蒙山，结果陷到了敌人“拉网扫荡”的“网”里。当时，罗帅想，敌人“扫荡”从来没有预先通知，这次一再通知，蹊跷，他和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原地未动，结果平安无事。1943年，住在莒南一个山村的罗荣桓得了尿血症，听说江苏当时叫江淮区有个泌尿科专家，便决定去那里医治。罗帅躺在担架上，指挥着又巧妙地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最后一道是大运河的陈道口，顺利去了陇海路以南，治好了病，又连忙返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一一五师大部去了东北，以其为骨干组成东北部队，东北的四野曾称林罗大军，进关打下平津，沿中国中部直打到两广、打到海南岛。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曾在天津住了一段，住在“冯家大院”。留山东的，以山东部队骨干与新四军、两广部队合为华野——三野，从山东打到淮海，打到江南，直至抗美援朝，既有四野也有三野的部队。从山西开过来的一一五师，成了种子，撒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有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又是红军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

说起当年“打鬼子”，国民党一级上将、军事指挥人物陈诚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抗日战争，有一段话：“如说日本是被我们给打垮了的，不如说日本是被拖垮的，以一个工业落后，装备羸败的国家，和一个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作战，前后历时八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不失为是一个奇迹。”他说，日军经过一年多，才攻下武汉，到此已感力量不足，在南北广大战场上，“除了移东补西地到处窜扰外，再也找不到决胜的机会，因之百万大军进退失据，便一齐陷下战争的泥潭。”陈氏在抗日战争这件事情上，一些看法与分析，和我们有颇多的相近。他曾亲自指挥过有名的淞沪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我们的抗战史书中也说，至1938年底这一段，日军集中在正面战场。在抗日根据地的范围里，只有少数兵力占据县城、集镇或交通要道，还无力向我们控制的广大乡村进攻，伪军数量也不多。在山东，随日军进攻的，只有在“七七事变”后就投降的“山东前进皇协军总司令”刘黑七等。

日本投降时，冈村宁次是日方被受降代表。这个沂蒙山人民的老对头，1947年国民党部队二次进攻沂蒙山时，是他当的顾问。陈诚说抗战八年，国民党“一无所获”，可是还获有这样一个“宝贝”当顾问。冈村宁次鬼点子多，比孟良崮战役时蒋介石的亲自瞎指挥，有些不同。使我们在南麻打胡琏的11师，没有打成功，与他的“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方阵”战术有关。

日本投降时，其总兵力除了东北59万，关内是128万，陈诚说的这“百万大军”，在转入“扫荡”后方时，是转过来64%，伪军90%。有人说，抗战八年打鬼子，是国民党打的，八路军只是其中的一路军。这一路军，可是不得了，牵制了这64%与90%，对“拖垮”敌人来说，绝对是作用极大。被“扫荡”的我们，部队人数是不如敌人多。1945年3月，我们打沂蒙山根据地中心最后一个据点蒙阴城时，用了4个团和地方武装5000余人，消灭鬼子一个加强小队百余人，汉奸12个中队1200人。歌曲中唱的“血战两夜，收复了蒙阴城，活捉唐云山（伪县长），消灭了鬼子兵，俘虏了汉奸队，七百多名（实900多名）；汶南、店子，据点一扫平，常路的汉奸队，吓得撤了兵，新泰县，增援兵，全都丧了命……”其中，打死了日中队长上山博荃，小队长大夫墟太郎和吉泽安道。我们此时，用的是以多胜少。此前的反“扫荡”那些年，我们是以少胜多。那当中，我们还于1940年9月和1942年1月，先后拔掉了铜井和郯城两个据点。

在沂蒙山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沈鸿烈部和李仙洲部先后撤走后，基本上没了他们的人，剩下的“游击队”、土匪等等，纷纷投敌，成了刘黑七那样的“皇协军”。刘黑七后又被国民党收编，编为36师，刘任师长。但对付我们，不次于汉奸。当时有



民谣唱：“中央军，是逃难的；张里元（沂水七县专员），是要饭的；三十六师（刘黑七），是捣乱的；八路军，是抗战的。”（《四种队伍》）后又再次当了汉奸。所以，我们在1943年11月，就在刘的老家，原费县今平邑的南锅泉村一带，把他解决了。1943年起，我们情况好转，连连拔据点，根据地扩大，打莒县，打沂水，北面三讨（伐）吴化文，南面两打王洪九，展开了全面反攻。鬼子投降前，又“扫荡”一次，是最后一次耍威风，一阵云烟而散。1941年12月，原沐水县今莒南县的渊子崖村，四百村民中的三百青壮年与千余鬼子血战。此村已有数年的抗战基础。当年5月，一一五师和山东党政军群八大剧团在此演出十天。村中各群众团体活跃，村四周有围墙、炮楼。杀敌武器除各种农具，还有土枪、土炮。已经与沐河西小梁家据点汉奸150人战斗过，汉奸是要钱要物给鬼子“进贡”，被拒绝，汉奸来打，没打得过，才约来鬼子千余报复。结果，鬼子被杀死112人，村民牺牲145人，加前来救援的县、区武装中，牺牲一位区委书记和一位区长，共147人。这112人若都是鬼子，战绩仅次于打蒙阴城。若一半或三分之一是鬼子，也不简单。想一想，全国遍地若有千百万个渊子崖，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分散开来的百万精兵鬼子，也不会撑打。

西朱范村的“爱民井”

王宗富

2015年8月6日的《长沙晚报》登载了特派记者李广军、通讯员尹芳的《少奇长孙阿廖沙辗转数千里重走爷爷抗战路》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阿廖沙是刘少奇的俄罗斯籍长孙，2015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阿廖沙一行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东海县，在刘少奇工作了四个多月的西朱范村进行走访、座谈。阿廖沙曾激动地说：“爷爷在我心中是一个英雄”。“爷爷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伟绩，贡献是全方位的。”李广军、尹芳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笔者向他们一一介绍刘少奇在西朱范村的工作遗址，并冒着酷热带领他们专门参观了至今还保存完好的一口清代古井（被叫做爱民井）的经过。当时我就在古井旁向他们讲述了这口井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这口井后来被叫做爱民井的缘由。他们心领神会，颇多感慨，并在文章中专门介绍了这口爱民井。

他们来的时候正值7月下旬，天气比较炎热。记得是午后一点多钟，大家步行前往刘少奇驻地遗址。没有什么风，知了在路边的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着。



乡间土路，高洼不平，人们都出了汗，但兴致很高。在一条南北土路西旁的一块枝叶繁茂的秋玉米地里，大家看到了那口古井，井台四周由四块平滑呈长方形的巨石砌成。井很深，但当时正值汛期，井水离井口仅有四五米的距离，井台四周荒草萋萋。就是这口井，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探源这口古井，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这个西朱范村里当时出了一个名叫王得胜的官居一品、任过总兵之职的武将，这口井就是王得胜退下来之后在自己家乡大庄园的花园里雇人开掘的，挖之前还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看过水脉。挖成之后井底有多处泉眼，水脉旺盛，水尤清冽，水质甘甜。除了浇灌园中的花木之外，村里人一早一晚也好到这里来挑水吃。因王得胜曾官居一品，令人羡慕，所以这口井被村里人称之为官井。因水甜味正，可口可意，6月天气，产妇喝了此井的生水都没有问题，一般人喝了，更是全身通爽，村里人很少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故又被人们誉为益寿井。

可为什么又叫做爱民井呢？原先我也不知道，这还要多亏了陈士榘将军的1987年的故地重游。

1987年春天，那时我还在东海县南辰中学任教导主任，西朱范村属南辰乡管辖。4月份的一天，我和一位老师骑自行车去西朱范村家访。那天天气很好，春意浓郁，由南辰到西朱范村有50里之遥，赶到时已是9点多钟。那天西朱范村犹如过节一样，街道净洁，彩旗招展，人们欢声笑语。听村里支部书记讲，是原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参谋长陈士榘将军来到这里，寻访当年战斗的足迹，并和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民兵进行座谈。11时左右，老将军在市、县领导的陪同下，和群众代表一起从村部大院里走出来，向村外走去。在村西小河西岸的一条南北方向的土路旁，老将军指着路西的大片绿油油的麦地说，记得这里原来是清末一位大官僚家的庄园，那是好大的一片建筑啊！抗日战争爆发后，西朱范村东边的青口镇、沙河镇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遍地烽火，兵荒马乱，大官僚的后人已四散而去，人去楼空，庄园荒芜。驻海州的日本鬼子曾接连两次在1939年夜间开着十几辆汽车，来王家庄园抢劫玉器珍宝、古玩字画、红木家具。被洗劫后的庄园更加凄凉、残破。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1941年来到这里，村里才红火起来。

陈老将军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说，往南走不远应该还有一口古井吧，那口古井很出名哩！周围群众都笑了，说不错啊，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那是王得胜家花园中的一口井，水好喝着呢，当时村里人都吃这口井里的水呢！

来到古井旁，陈老将军驻足良久，深情地说，这口井养育了多少人啊！停了停，老将军又说：“当时村里人喜欢到这口井边挑水用，部队来了以后，也好到这儿来挑水，平时还可以，可到了1942年端午节后，由于天气大旱，井水就不够用的了。那时化名胡服的刘少奇同志就住在附近的院子里，他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山东指导工作，处理山东问题的。一天晚饭后，他借出来散步之际，找到了我和罗荣桓政委，对我们讲，这口井水是好喝，来这里挑水确实也比较近便。可事实上水是不够用的呀。你们说该怎么办才好？”

罗政委说：“大忙季节，因吃水问题给群众带来麻烦，是不应该的。”

“对！”刘少奇紧接着说道：“不能与民争水，要动员部队的指战员，及山东分局机关的同志，到村东面的沙河里挑水用，把井里的水让给老百姓吃。这样虽然远一点、累一点，但我们要克服！”

第二天部队的同志，机关的同志便主动到沙河里挑水用了。

谁知村干部知道了这件事后，也动员群众到河里挑水吃，要把方便让给部队。部队的战士们便拦住他们，说服他们，叫他们到井边去挑。后来村里群众很受

感动，便找西朱范村抗日小学的高敬斋校长写了个牌子，插在井边上。木牌上的“爱民井”3个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隔老远就能看到。

陈老将军自豪地说：“就这样，这口井又多了个爱民井的名字！”

爱民井，体现了刘少奇同志对群众的关心和体贴，也反映了战争年代军民一家的鱼水关系，至今还被传为佳话。

阿廖沙一行中有位女同志，2015年夏天她不但用相机把这口历经沧桑的古井拍摄了下来，还当场吟诗一首：

百年古井现青春，硝烟岁月动人心。

徘徊井边思往事，最是军民情谊深。

1987年4月的那天，陈老将军要离开西朱范村时，我又挤到车前，对银发飘然的陈老将军说，围绕“爱民井”肯定还有很多故事吧。陈老将军笑了，“说句实话，西朱范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西朱范村的山水养育了我们，老百姓热心热肠地帮助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也忘不了啊。”

接着他又向在场的群众讲了爱民井的几件往事……

部队1941年刚来到西朱范一带时，由于从西边过来的人多（尤其是山西、河南、安徽、鲁南等地方的人多），多数不会用井绳从井里往上面提水，他们大多数都用安在井边的轱辘往上汲水。因而村里的老百姓不但把用麻或苘麻搓成的井绳拿给他们用，还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如何把系在井绳一头的水桶续到井里，如何在水面上把桶放倒灌满水，如何弯腰双手交替把水桶提上来。熟能生巧，后来战士们都能轻松地提水了，挑水了，又在师部警卫连的倡议下，抽时间给村里的老人们送水，给部队的医院送水，给抗日小学送水……

最令人惊心的一次是在1942年夏天的一次午后，刚刚下了一场雷阵雨，水沟里流水“哗哗”，蛙声此起彼伏。由于那口井在花园的院子里，而附近又住着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所以这一带不仅有流动哨，古井周围还有固定的岗哨。为了辨识前来挑水的人是否是村里的群众，每班岗都配有村里的一名民兵。那场雨后，一个头戴斗篷的人挑着水桶急匆匆地往井边走来，斗篷前边拉得很低，遮住了整个脸。站岗的小战士有些疑惑，前来挑水的人一般不是这样的呀，他们都会热情地同战士们打招呼。小战士叫住了那个人，而同在岗位上的民兵也不认识那个人。小战士问他是哪里人，那个人说就是这个村里的，住在最后边。民兵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怎么不认识你。那人又改口，说是村里抗日小学雇的炊事员。小战士说昨天我给抗日小学送水，怎么没见过你啊？那人又说，我可能不在学校里呗。小战士又追了一句，抗日小学有几个炊事员，那人一时语塞，遂扔下水桶往东边的小河边跑去，刚要往河边的树林里钻，便被巡逻的战士们逮个正着。从那人身上翻出了一大包用纸包着的红矾，他是准备趁打水之际把红矾投到井里去的。经审问，那人是从沙河据点来的一名汉奸，受鬼子的指派，化妆成挑水者前来投毒，以制造混乱，鬼子则企图趁机偷袭驻在村里的领导机关及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

老将军最后笑着说，我们的战士和民兵的警惕性很高，所以敌人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所以“爱民井”的称呼才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而今，“爱民井”依然静静地坐落在路边的田地里，前来这个位于苏鲁两省三县交界处的村庄感受红色风情的游人，节假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在“爱民井”旁徘徊，或沉思，或感叹，或拍照，或流连……这口百年古井正时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正能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动人容姿。

铁军大帐追歌行 (一)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湖北汉口——铁军归来兮

(1937年12月25日——1938年1月4日)

汉口新四军军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胜利街（原大和街）332—352号（原大和街26号），是新四军军部诞生地、第一处旧址。此处原为日本侨民住宅，是一座沿街二层楼房，上下房间对称、各房间分为内外两小间，二层各大房间沿街面有长阳台走廊相通。抗战爆发后，日本侨民回国，该楼房被国民政府作为“逆产”没收。武汉失陷后，被市民占用为民宅。

1937年11月12日，叶挺奉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从延安赶到到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经与国民党当局协商，将此处设为新四军军部第一个办公地点。郭沫若于1938年1月9日来到武汉，应叶挺邀请来到汉口新四军军部居住；4月1日，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月底搬到武昌珞珈山。

由于军部在汉口时间极短，武汉会战中城市又遭到日军飞机大轰炸，历史档案

在战争中缺失，新四军第一任军部在汉口的历史事实与军部旧址渐渐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直至1997年，为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拍摄纪录片《铁的新四军》，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才被重新得以确认。2002年12月25日，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原貌修复，并辟为纪念馆，2006年12月25日，纪念馆开馆；2013年3月5日，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列入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东方巴黎落难日，汉口叶挺吼如狮

1937年11月12日，万里长江的东口岸、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大上海，在经历了近百天枪林弹雨、硝烟烈火、血肉横飞、反复争夺的激战后，终于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昔日美丽繁华的上海滩，一时到处招摇起丑恶而血腥的“膏药旗”，沪人含愤垂泪，国人扼腕叹息。

大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是华中地区的海上东大门。而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迄汉水，东到海滨，包括苏、浙、皖、鄂等省和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点，更包括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这一地区多为平原、丘陵、河湖港湾，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交通发达，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自然也成为日寇垂涎欲滴、势在必得的战略要地。于是，日寇自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又于8月13日，悍然向华中地区的东大门上海首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先后投入20多万兵力进行后续作战。中国政府自然不能轻易把这头恶狼放入心腹之地，随即先后组织调动70多万大军，展开了淞沪保卫战。大上海随即变成了一片战争的火海。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3个月顽强的抵抗，但由于指挥者底气不足，指挥失算，部署有漏，调整迟缓，狡诈的日军从杭州湾偷袭登陆，从淞沪地区中国守军侧背实施迂回包围，插向了致命的一刀。蒋介石见腹背受敌，守军长官惊惶失措、无心恋战，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下令全线撤退，向西、向南转移。

上海失陷，等于由东向西暴露出中国首都南京的胸膛，再向西则是华中腹地武汉重镇。若南京、武汉不保，日寇的尖刀无疑于直接插入了中国的心腹。东北早沦丧，华北已陷落，华中若再失去，华夏大地将精华尽失，中华民族命悬一线。

中国命运究竟如何？中国人究竟如何？

华夏不能灭，炎黄不能亡。在历史最危机的关头，总有巨人英雄挽狂澜为己任，扶大厦于将倾。淞沪大战，就是国民党数十万守军仓惶逃离时，也在上海滩留下了千千万万誓死抵抗、保家卫国的忠魂：

上海市区华德路口：中国军队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宝山区姚子青营：中国军队500多名官兵，在坚守阵地4天4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后，最后绝大多数壮烈殉国，余生无几。

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国民党第88师524团团团长谢晋元率领全团800多名英雄壮士，孤军坚守4昼夜，杀敌数百，最后突出敌重重包围，退入英租界。

……

这些忠魂呐喊出的中国救亡的唯一真谛，只有一个字“拼！”用血肉之躯与钢铁意志，与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拼”！

为国殉难忠魂的呼声，立即在大江上游、华中腹地的武汉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应：

就在上海沦陷的同一天，刚刚被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的叶挺，千里迢迢、快马扬鞭地从陕北的延安赶到武汉。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叶挺便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向中外新闻界发表就职讲话。

叶挺的讲话激奋昂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几乎是在大声疾呼：“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无论到怎样地步，都要去拼。一夫拼命，万夫莫敌。舍得拼死，抗战就没有不成功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多难兴邦’。目前日寇侵略，正是我们多难的时候，我们团结抗战，必然也就是我们兴邦的日子……只要团结一致，前途一定是胜利！日本最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最希望我们的就是涣散。凡是日本人怕的，我们就要去做；凡是日本希望的，我们就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

崭新的新四军，忘死一个“拼”，真诚恳切的一个“团结”，信心百倍的一个“胜利”。挺胸振臂、顶天立地的叶挺如同一头东方雄狮，其一番讲话恰似一声仰天长啸，让正在战火弥漫、狼烟遍地的中国大地上与侵略者抗争的全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片夺目的曙光，听到了一声震聋发聩的响雷！

二、八省红军游击队，劫后余生成一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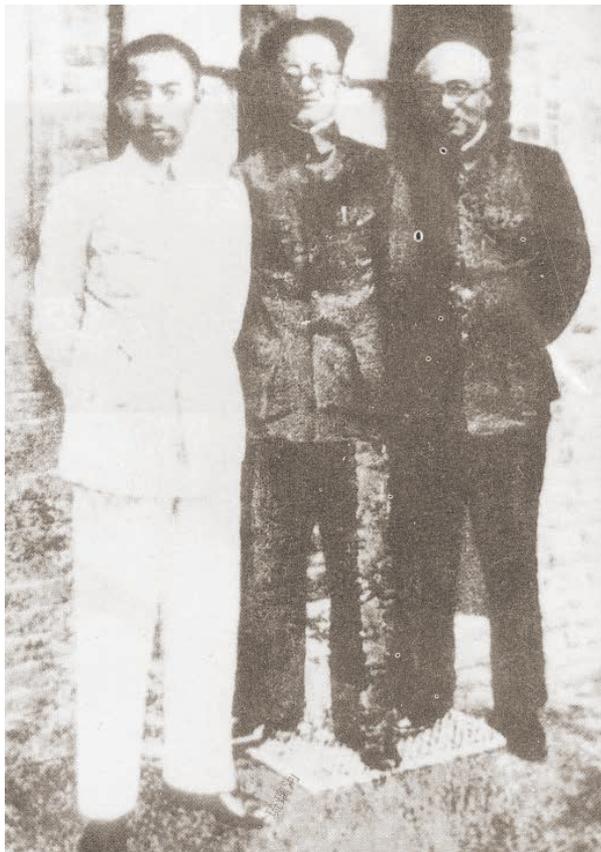
在挺身而出的军长叶挺身后，列队雄起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最重要的正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八路军的“兄弟军”——新四军。

新四军的成立，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力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复斗争、多方争取的结果，也是中共中央、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八路军办事处之间密切互动的过程。

1、共产党数度敦促国民党，国共金陵定协议，八路军首先列编。

早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于1936年12月23日，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六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就是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为先保住自身性命，蒋介石被迫同意了这六项条件，但却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而是大言不惭地表示以他“领袖人格”保证这些条件的履行。虽然言而无信是这位领袖的公认的特点，但是，这毕竟是他10年以来在口头上承认共产党和红军“合法化”的开端。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尽快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同时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参加庐山谈判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

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表示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运会上，蒋介石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他提出一些与共产党谈判的原则与条件，则与我党主张开始靠近，表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落实承诺，从1937年2月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应蒋介石之邀，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秦邦宪等人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甚至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举行谈判。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数次谈判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6月上旬，周恩来等应邀一上庐山，与国民党当局再次进行谈判。蒋介石为了使我党我军失去政治领袖、军事首脑与精神支柱，竟然异想天开，企图用过去对待敌系军阀头目的伎俩，向我方提出让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的无理要求，遭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

1937年7月7日，华北日军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守军第29军一部奋起反抗，全国全民族抗战开始。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再次呼吁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作战的准备。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共产党关于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主张和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撤销苏维埃政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项保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向蒋介石送交中共《宣言》，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改编红军、苏区改制等事宜。7月17日，在中共的推动促进下，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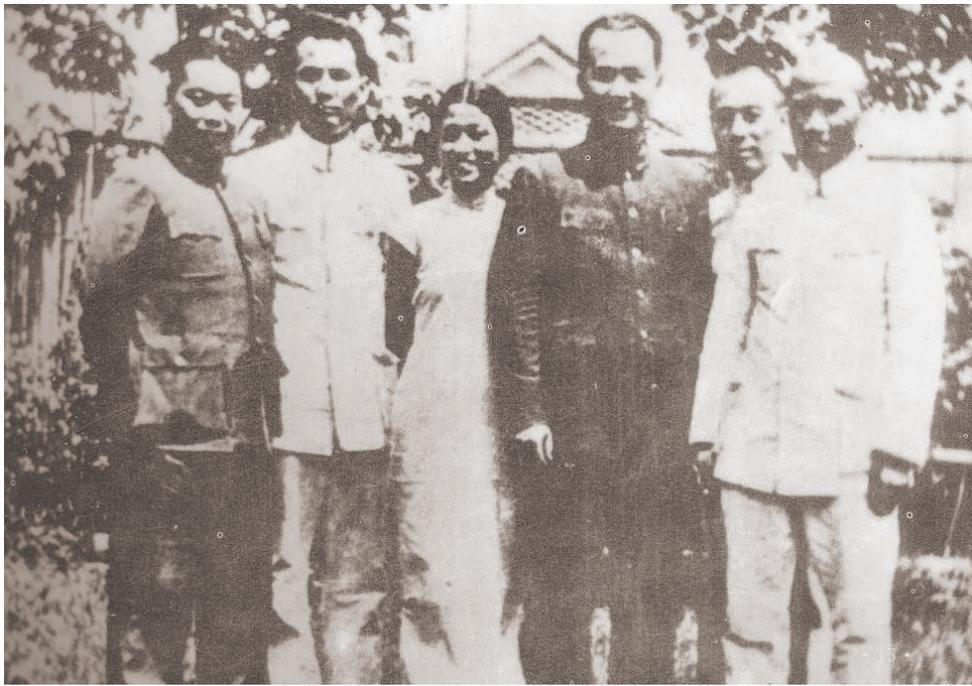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宣言，构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是他在骨子中根本不甘心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对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的具体方案也处处否定，甚至又一次提出逼迫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的要求，由他和国民党来控制并吞并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再次明确表示：中共中央断然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第二次庐山谈判又不了了之。

8月上旬，日军进攻步步紧逼，形势日益紧张。华北、平津已经沦陷，淞沪会战随即打响。蒋介石军队虽多，但他对自己部下的抗战意志和战斗能力究竟如何心知肚明，急于调动誓死抗战的红军开赴前线作战，故而对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于是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继续就合作抗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赶赴金陵。8月19日，国共两党在双方又各作一些让步后，终于首先就红军主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3个师，每师2旅。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参加南京国防最高会议的周恩来（右2）、朱德（右1）、叶剑英（右5）

会又按全国海陆空军统一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但此后仍沿称八路军，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朱德改称总司令，彭德怀改称副总司令。

2、党中央急寻南方游击队，中共代表团三上庐山，游击队终成一军。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红军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方游击队的集中改编问题，却由于中共中央与其长期失联、情况不明，又与国民党分歧尚多，悬而未决。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著名的万里长征，其他各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也相继开始了战略转移。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

当时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十几个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共计1.6万余人，加上机关人员和伤病员，总计3万余人。长征途中，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于10月22日致电项英，指示成立中央军委，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24师和10军。项英他们和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在赣、粤、浙、闽、湘、鄂、皖、豫8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皖浙赣边、湘南、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鄂豫皖边、鄂豫边、浙南等14个地区，展开了异常艰难困苦的斗争。

红军主力撤退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了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式的持续进攻和残酷清剿。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杀尽烧光的灭绝人性的方式与手段，所到之处，血流成河，废墟四野，一片尸骨遍地、万户萧疏的悲惨景象。

1935年3月9日，项英和陈毅率部突围，下午5时，用电台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可惜由于中央改用了他们没有的另一套密码，电文没有译出。此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子弹在身旁呼啸而飞，情况万分危机。抱定必死的决心，项英命令砸掉电台，烧毁密码，迎敌而上。从此，他们就与党中央失去了一切联系。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也皆与中央失联。但是，他们凭借着伤痕累累、孱弱单薄、饥寒交迫的身躯中的一颗赤诚红心和钢铁意志，在九死一生、近乎绝地的环境中，与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己的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拼



项英



陈毅

争，坚持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当前状况，中共中央、毛泽东十分惦记而又焦虑。西安事变后，国共启动合作抗日谈判，党中央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并指示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秦邦宪等人，想方设法，抓紧与各根据地游击队取得联系。1937年7月初，毛泽东又亲自选调了郑位三、肖望东等几位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奔赴鄂豫皖边区，寻找坚守在那里的原红军二十五军（后改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部。

虽然还没有取得联系，但是党中央相信各游击区的同志们肯定也在极力寻找党中央。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步伐加快。为了保证南方各游击区工作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与政策，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共产党的路线而斗争。

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整编，中共方面从一开始就将其与主力部队的改编作为一揽子计划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但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却心怀叵测，另有鬼胎，早就制定了“北和南剿”的计策。初始，他们拒不承认红军南方游击队的存在，后来在铁的事实面前又提出南方游击队与红军主力不能同等看待。就在国共合作谈判的同时，他们恶人先动手，暗中调动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加紧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残酷清剿，妄图在双方达成合作前，将我各游击队分别缴械瓦解，彻底铲除，从而拔除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并且制造了扣押、杀害我寻求合作的游击队人员的“漳浦事件”等恶性事件。

在“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终于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中共方面再次提出抓紧统一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要求。

南方红军游击队虽然地区分散，兵力各异，总数不多，装备极差，但是国民党以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兵力数年清剿竟然也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红军游击队竟然创造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这让国民党不能视若无睹，而且也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看到了这一点，他提醒并建议蒋介石：“对他们如不收编，这么多武装留在后方，倒是心腹之患。”

这句话提醒了蒋介石。迫于大局，也出于消除后顾之忧，8月25日，国民党再次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三上庐山，就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谈判。此次谈

判，国民党方面派出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但是在共产党人面前一向傲气、霸气、杀气十足的蒋委员长，生怕属下把持不住“圣意”，不惜“屈尊”亲自参加谈判。经过三天艰苦激烈的是非之争和唇枪舌剑，国民党方面终于勉强同意将中共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建制上设为一个军，归国民党和延安的中共中央双重领导，而在整编后的组织方式上，却又极力主张各边区游击队应全部集中。在这里，蒋介石又埋伏了一个不良用心：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由国民党派员进行编遣，然后统统调离江南，趁机将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赶走或吞并，共产党在南方的各战略支点也将不复存在，可谓一石二鸟。

对蒋某人的这点小伎俩，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已洞若观火。考虑到南方各游击区是我党和红军10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决不能轻易放弃，而且红军游击队一旦完全集中，极有可能被向来背信弃义的蒋介石以某种借口一口吃掉。因此，在开始时候，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明确要求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地开展抗日斗争，坚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党的绝对领导。10月1日，为确保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的指示。10月2日，毛泽东、洛甫在给叶剑英、秦邦宪的电报中，又再次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

但是，此时的形势又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新的发展变化。就在前几天的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蒋介石不是个作茧自缚者，但在目前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已成既定下，他暂时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打嘴巴，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大加杀伐。

根据形势发展和各边区游击队的现状，叶剑英、秦邦宪等经过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可能与必要，得出了红军游击队还是集中为当的结论。10月8日，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联名致电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应坚决保持其为战略支点，是绝对必须的。

二、但现在各地区之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为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大多数现极为分散，一集结则给养无法，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

各地军阀均利用这力量补充自己。

三、我们以为，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一）成一个整体的力量不致分散。

（二）可直接属我们领导。

（三）补充给养均较好接洽领取。

（四）该军以后仍可要求人员补充区。

……

四、各地方仍可公开与秘密的留一部分武装，保卫小根据地及发展革命运动。

五、游击队问题再难拖延，因接济给养大抵都是临时的，天寒棉衣均成问题。

他们的负责的符合实际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慎重研究，毛泽东于10月18日复电，同意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一个军。

而在此时，党中央也终于与南方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国民党当局则单方面抢先任命了这支新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大名鼎鼎的叶挺，并在叶挺建议下，为这支军队命名——新四军。

3、游击队主动出山抗战，三年劫难终得渡，万名赤子重归党怀抱。

1937年8月下旬，受毛泽东之命，作为党中央的代表，郑位三、肖望东等几位同志，首先赶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在叶剑英等领导帮助下，于下旬到达湖北七里坪，与坚守在相

对独立的鄂豫皖的原红军二十五军（后改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部胜利会合，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并着手协助高敬亭整训部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更让人激动而欣喜的是，长期失联、久无音信的中央根据地负责人项英从江西南昌给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发来了联系急电：

剑英、泽东诸同志：

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

项英

与此同时，叶剑英等也从报纸上，看到了项英、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于9月29日在南昌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号召各地游击队停止游击战争，“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的战斗”。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项英及南方根据地的同志们这些年来消息是何等闭塞，对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是何等的知之甚少，叶剑英、博古等人既感叹，又心酸；但他们又为项英及同志们在如此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仍然努力寻找并响应党的号召、为党的事业执着探索、奋斗而深为感动。为了了解这些年来的详细情况，并向项英等全面准确地传达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叶剑英等决定，立即给项英回电，请他们来南京当面详谈，并把项英的电报立即转给了党中央。

电报发出的当天，叶剑英等就收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急电。原来，中央此时也已看到了项英在报纸上发表的公开信，并对项英的一些说法与做法提出了批评：“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方的做法带着危险性。”

叶剑英等见此电报，更为焦急，立即又给南昌发出电报，催促项英急速赶到南京。然而南昌回电称，项英因公务繁忙，已返回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驻地。

10月2日，毛泽东、洛甫又急电叶剑英、博古等：“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叶剑英、博古等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携带亲笔信，昼夜兼程，于10月11日到达赣粤边根据地，找到了项英。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三年的项英，见到党中央派来的联络员，万分激动，热泪盈眶。明白来意后，他于第二天即与联络员一起，乘车而行，风驰电掣，赶到南京。

劫波渡尽，九死一生，患难战友，久别重逢。项英与叶剑英等拥抱握手，唏嘘不已，万千感慨，一言难尽。

原来，项英等自从与党中央失联后，一直坚持孤军奋战。在国民党连年的疯狂围攻剿杀下，原来的部队只剩下了3000余人。虽在深山密林，消息闭塞，但是他们以高度敏感的神经，时刻密切关注与感知着外界的哪怕一点点信息与变化。1937年7月后，包围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突然停止了军事“清剿”，高度紧张对峙了多年的战斗局势骤然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等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位同情我党的小学教员处获得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果然从中发现了卢沟桥事件爆发、全民族开始抗战、国共开始合作的重大消息；更从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中，知道了中共致电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等。同时，还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江西省政府成立了所谓的“招抚委员会”，专事与共产党游击队的接洽、协商等事宜；赣州地区国民党若干县长还联名发出《告中共同志书》，其中称道“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比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

日事宜”云云。

终于得到了党中央的消息，知道了时局的重大发展变化，项英、陈毅如冲出夜幕，欣喜若狂。但是他们又对国民党的态度与作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分析，国民党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还是意在收买我红军向其转变、为其所用。但是为了不失时机，扩大政治影响，掌握斗争主动权，在还没有与中央取得联系、没有当面听取到党中央的全面准确的指示精神前，他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首先将南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抗日力量，与北上抗日的红军力量相呼应。他们召开了干部大会，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一周后，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合作抗日。并决定由陈毅出任全权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中，突出强调了“改编后的红军部队，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建制等的独立性”等主要原则。

9月8日，陈毅先后到大余县池江和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46师代表谈判。国民党第46师代表竟然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陈毅对这种混账议论十分震怒，拍案而起，厉声质问：“你究竟代表谁说话？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你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要抗日，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国、美国也挡不住！”陈毅大义凛然的一番怒斥，说得对方无地自容、哑口无言。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用国民党的电台，向我党中央汇报情况，但均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9月24日，项英以南方红军游击区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和陈毅先后到达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再次进行谈判，商定红军游击队出山抗战的一些具体问题。直到这时，他们才从报纸上正式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与党中央的思想精神相对照，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国共合作的方向和方法，使谈判终于获得成功。26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就在此时，他们得知叶剑英、博古等人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消息，项英急忙发电报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但是电报发出后两天没有得到回复，项英便先返回了赣粤边驻地。

听完项英的详细介绍后，叶剑英、博古觉得项英他们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中，因对党的具体要求不了解，有不妥之处，但在总的方向、大的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迅速把这一情况电告党中央作了说明，以消除中央的担心，并告诉项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已多次请他速去延安当面汇报，请他抓紧动身。项英也早已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向延安。此时，他们已经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联络、接待等。项英要求陈毅对接洽处的工作负起总责并交代了具体事项后，于10月26日启程，从南京奔赴延安。

在备尝了与党中央长期失联的痛苦与迷惘，经过三年生生死死的日日夜夜后，项英代表当年留在南方数万红军中仅存的万余名党的赤子，终于去向了新的革命中心地，回归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秦士文：为全忠与孝，除夕送家堂

王建



秦士文画像

除夕请家堂（鲁中对春节祭祖仪式的称谓），初二送家堂，是传统春节期间最为神圣重要的仪式。新泰平阳河畔的秦玉昌家与众不同，初一就洒下美酒，燃起爆竹，恭敬地举办送家堂仪式，比别家整整早了一天。

秦玉昌说，前些年还不是这样，秦家是除夕送家堂。这特殊的送家堂时间，要从秦玉昌的祖先、东蒙秦氏第七世的秦士文说起。

除夕送家堂

秦士文，字质之，号彬予，明隆庆三年（1569年）生于蒙阴汶南杨庄（今属新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官，官至兵部尚书，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天启五年（1625年），秦士文丁忧期满，入京报到。不巧此时官位无缺，秦士文在京无事可做，眼看春节临近，便决定回乡，一边与家人团聚一边待缺。

中原大地沉浸在迎接春节的喜庆气氛中，长城外的草原上却战云密布。鞑靼十万余众逼近宣府、大同，明朝急需得力干员主持前线军务，因秦士文在边塞政绩突出，便急召其回京。

圣旨到达秦士文在蒙阴的老家，正好是除夕那天。秦士文已经摆好供品，请了家堂，正与家人欢度春节。军情紧急，必须马上启程，秦士文赤心报国，没有半点迟疑。可他毕竟是一家之主，走了谁来送家堂？忠孝似乎难以两全。秦士文决定，当夜送家堂，然后启程返京。

这是秦士文最后一次以官员身份回乡，在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从此，为了纪念秦士文的忠孝之举，秦氏后人每年在除夕送家堂。秦玉昌说，直到前些年，为了祭祀方便，才改在初一送家堂。

对于家族的这一特殊传统，秦玉昌小时候不以为意，大了开始好奇，听老人讲了这个故事，又想从史料中一探究竟。

2002年，秦玉昌到北京学习，在朋友的帮助下，一头扎进了国

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书海。家族传统与史籍中秦士文的足迹果然严丝合缝，“秦士文是除夕夜里走的，正月初十到的北京，当天觐见皇帝，第二天就以山西观察使銜备兵怀来县。”

查完典籍，秦玉昌又萌生了新的想法——寻访秦士文战斗过的地方。朋友弄来一辆面包车，负责开车加油，秦玉昌管食宿，沿着长城一路向西，走了七八天。

当时是三四月份，气温很低，裹着大衣还冻得哆哆嗦嗦，风沙扬面，睁不开眼睛。两人人生地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吃了不少苦头，也看到了不少壮美的景色。雄伟的崇山峻岭，极险的悬崖处，桃花盛开，灿烂炫目。

秦士文大概无暇欣赏这美景，因为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金戈铁马：

天启元年（1621年），秦士文奉命巡阅河西诸镇，河西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横贯2000余里。沿途荒漠峻岭，车舆难行，秦士文骑马昼夜驰骋于番部中，五个月往返行程近万里，历尽风寒霜苦，掌握边情，督导边备。

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鞑靼毛乞炭挟赏不遂，由盆儿梁率部入侵常胜堡、宁疆堡，参将张承宪部全军覆没，秦士文率军赶到，将入侵之敌击退出境。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瓦剌、鞑靼七庆台吉部有突犯图谋，秦士文命下西路副将李时芳，洗马林副将杜维栋，各领兵三千于要路埋伏，副将焦迎恩、徐冕统兵三千迎敌。台吉大败，取得30年不多得之奇捷。

同年五月，鞑靼火落赤骚闹台吉会合湿布抽扣儿毛乞炭，集合诸部万余骑计划进犯龙门所，秦士文调兵遣将，采用火攻战术，辅以诸军围剿，大败鞑靼。

同年六月，松木儿、下刀儿部入侵黄家堡，秦士文与诸军合力戮敌，获大胜。

……

天启六年至七年，蒙古频繁入侵宣府，战事不断，秦士文年近花甲，仍披甲治军，常数日目不交睫，长期鞍马劳顿，须发尽白。

从北京到南京，杨庄才有虎皮松

秦士文擅长边事，每到一地不仅能连战连捷，还能让该地军备重整，军心复振。

备兵岷洮期间，秦士文“持大体而不拘繁杂，清吏治，严军纪，严惩贪官及失职之人，顿时副将、守令有劣迹者望风而去，其留任者洗心奉职，军心大振”。秦士文修筑城墙，强化军备，推行“清隐占、补行征、惩贪墨、兴屯利、明烽堠、兴茶马、革互市”等政策。岷洮法纪松弛、吏滑将骄、军备懈怠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三年间，瓦剌匹马未入，明朝未折一矢、未损一兵、未糜一粟。

巡抚宣府，秦士文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官兵老弱病残近半，军马骆驼疲弱者近半；屯粮仅虚有其名，欠军饷达数十万；官兵衣食无着，军心涣散。秦士文大刀阔斧整饬改革军务，“宣恩威以厉士气，宽法纲以怀将心，屯盐粮以佐军需，清抚赏以结属夷，革冒滥以杜漏卮，募强锐以补缺伍，明侦探以时备御”，同时罢幕府、简幕僚，严惩侵占公有钱财的官吏。秦士文身先士卒，亲居边塞要冲，“士气为之一振，奢糜松懈之风顿消，吏治军备井然”。

秦士文治边政绩斐然，与其早年担任一方父母官的经历不无关系。

中进士后，秦士文先后任宝坻、密云、长治知县。宝坻隶属顺天府，取“如坻如京”之意，是个多民族聚居区；密云素有“燕国天府”之称，又居边塞，兼具民政和军事价值；长治位于上党腹地，素有“宗藩大国”“山西巨郡”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县都是“剧邑”“繁邑”，即政务繁重的地方。

秦士文上任宝坻知县后，“清徭粮、革火耗、核屯田、理狱讼、辟书院、倡教

化”；议定朝廷贡品宝坻银鱼的贡额，减轻渔民负担；平息宝坻与三河、香河两县因泄洪引发的械斗；惩治仗势欺人的宦官高准的家丁，并奏请弹劾高准。任密云知县期间，秦士文“劝农桑、清积案、明教化、弥盗奸、兴教育、革陋习，以民政佐军机，政绩卓然”；购军械、筹军粮，助明军击退入侵的鞑靼；抵制劳民伤财的修筑长城墙子岭内女儿墙工程。调任长治县后，秦士文清理民政狱讼、确定绸贡数额，罢免内使骚扰。对秦士文，三县吏民无不称颂。

备兵岷洮时，秦士文任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提刑按察使司佥事。秦玉昌考察明朝建制，估算秦士文所辖部队人数在七万至十二万之间。这些人之所需全靠朝廷拨饷，当时朝廷按每月30日发饷，而月有大小，这样每人每年可以结余6天的粮饷。秦士文备兵岷洮三年，部队结余非常可观，他分文不取，如数上交朝廷。

当时明军腐败严重，将领多克扣粮饷以饱私囊。秦士文上交余饷的举动令明熹宗非常感动，熹宗令户部核实后，将全部余饷赏赐给了秦士文。

有了皇帝的赏赐，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的秦士文才在为父亲丁忧期间，在蒙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住宅，秦氏族人称之为西宅。“西宅建得非常排场，占地就二十多亩，前为二层沿街楼阁，院内分前厅、后厅、大金斋、小金斋、左廊坊、右廊坊等建筑，设九个独立院落和一个后花园。”秦玉昌不止一次听老人说起过西宅的辉煌。

秦士文还扩建了杨庄园林，园内有数株罕见的粗大虎皮松，当地至今还有“从北京到南京，杨庄才有虎皮松”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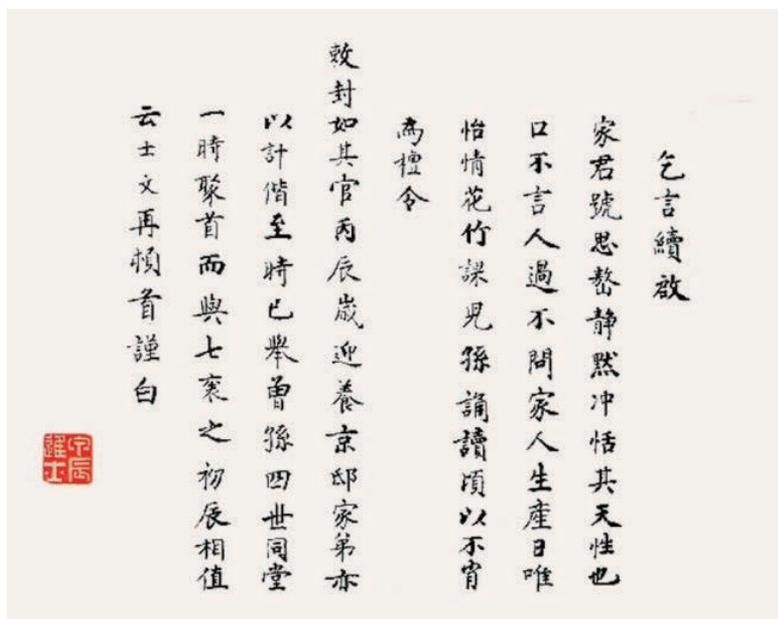
康熙帝三次驻蹕秦家

崇祯元年（1628年），秦士文晋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久历边塞风霜的老将，此时已积劳成疾，上书请求回乡，崇祯皇帝赐归调理。

五月，秦士文病情加剧。21日，“正襟危坐而逝”。“统六师，掌邦政，著绩严疆，丰裁凛凛，朝野共钦”的一代政治家和军事家走完了一生的旅程。

秦士文去世后，明王朝内忧外患，渐渐走向穷途末路，秦氏家族也随着明朝的风雨飘摇而饱受磨难。

崇祯十四年（1641年），“土寇”史东明部攻打蒙阴县城。正准备赴京参加考试的秦士文次子秦玘感到“吾家世受国恩，兵至辄先去之，于义不可”，留下守城，力



秦士文手迹

尽被执，死时高呼：“吾死城以报君，死宗庙以报亲，吾何悲哉！”

清顺治四年（1647年），丁明吾部农民军攻破蒙阴县城，秦士文长子秦琮、三子秦璿、五子秦玫、六子秦瑾和两个孙子秦之驢、秦之骅守城时战死。

四子秦羽在外任官，躲过一劫，他在《鸿雪居士序》中写道：时族人“数百口半没于兵间，宇舍悉烬……遂接茅东山，因岩以栖，拾橡栗自给。素为膏粱，至是手足胼胝，一裘温蔽，累累如悬鹑”。

恢宏壮丽的西宅亦随着家族的苦难而衰败，据秦玘之子秦之驥记载：（西宅）先遭清顺治四年兵燹，“邑墟于兵，庐烬于燬”；后历康熙七年地震，“一时城居乡宅，倾圮无余，向时之巍峨，尽为荒烟瓦棘”。

族人惨遭屠戮，宅院日渐破落，东蒙秦氏并没有因此而沉寂。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只能从精神层面去寻找其支撑力量，秦玉昌认为：“在优秀家族传统和丰厚文化底蕴的熏陶感召下，秦氏才能在东蒙土地上，生生不息、自立自强。”

明初，为逃避“靖难之役”带来的战乱，秦氏先人从单县迁到蒙阴常路北楼村，东蒙秦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家族。

东蒙秦氏勤俭持家，家境日渐富裕，同时生齿日繁，族人扩展到临近的汶南等地。到第四世秦纪时，已富绝东蒙。第五世秦弘时，田产剧增，家境更加殷实。

第六世秦希夏，也就是秦士文的父亲，是位医生。秦希夏游历京城时，皇陵正在施工，民工当中疫病流行，他经人推荐，在工地设肆施药，救活了数以千计的民工。皇陵竣工后，秦希夏因功成为太医院的御医。

秦希夏请先生教授子弟。在父亲的悉心教导和家族文化的熏陶之下，秦士文“五岁即能读孝经，习幼仪，举动潇洒儒雅”，最终官至兵部尚书，弟弟秦士楨“刚毅果敢，文名冠世”，天启二年（1622年）也考中了进士。

受长辈影响，秦士文也很重视对族人的教导。他要求族人“居官者以清白自励，以点染为耻；在学者以读书自励，以奔竞为耻；为布衣者以衣桑自励，以入衙为耻”，“凡族人要老慈幼、少敬长、生相贺、死相吊、善相劝、过相规、难相恤。一族相与，宜公、宜和、宜让、宜忍。勿夸以财，勿轧以势，勿争名，勿夺利，勿相谗，勿相字。卑幼尊贵遇贫穷之尊长必执弟子之礼，不得挟贵；卑幼至尊长家中不得当客居位，有不平之事，必先告族长调处，不得擅自诉讼”。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东蒙秦氏元气渐复，虽然规模不如以前，但还是修复了西宅，随着人口繁衍，又新建了东宅。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东巡路过蒙阴，驻蹕秦士文曾孙秦洗家中。秦玉昌说，康熙皇帝住的是东宅的清闲阁，“皇帝来了就住在里面，走了用石头垒上。”当时恰逢小雪，康熙皇帝登蒙山观雪，写下了《蒙阴晓雪》一诗，并免除了蒙阴次年的丁徭。

此后，康熙皇帝又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四十二年（1703年）两次驻蹕秦洗家中。第三次到秦洗家时，康熙帝赠送秦洗御碗十只，并御书匾额悬于大门之上。至今，秦氏后人还保存一只康熙皇帝赠送的御碗。

历经历史风雨，东蒙秦氏的东西两宅已不见踪迹，但家族文化传承不息，明清两朝进士、举人，监生、贡生、廪生、庠生等以百人计，至今仍人才辈出。

王俭解选

杨 赛

翻开并不算长的《南齐书·王俭传》，王俭两封要求解去选官的上书赫然收录其中。王俭历任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国子祭酒、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等职，为什么单单三次要求辞去参掌选校官员的差使呢？史官为什么要详细地抄录王俭的两个辞呈呢？看来，王俭解选是南朝士文化中的一件大事。

王俭出身于琅邪（今临沂）王氏，是北地著族。其祖父王昙首在拥立宋文帝刘裕、诛徐羨之、平谢晦中立了大功，被封为侍中、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死后，又被追封为豫宁县侯，配飨太祖庙庭。（《宋书·王昙首传》）其父王僧绰为王昙首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被宋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资治通鉴》“武康公主”）招为驸马。元嘉二十六年（449），王僧绰做了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宋书·王僧绰传》）元嘉二十八年（451），二十九岁的王僧绰得以迁侍中，任以机密。两年后（453），刘劭弑逆，王僧绰遇害，享年三十一岁。

王僧绰遇害之时，境况十分凶险，亲戚们都劝王僧虔逃跑。王僧虔说：“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他收养了王俭，对之疼爱有加。孝武帝初年，王僧虔调出京城到武陵作太守。王俭中途得病，王僧虔寝食难安，同行的人来劝慰他。他说：“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无复游宦之兴矣。”（《南齐书·王僧虔传》）齐世祖即位，王僧绰平反，被追赠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王俭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王俭不仅世为高门，戚系更是皇族。何点作《齐书赞》云：“（褚）渊既世族，（王）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梁书·何点传》）之所以称王俭为舅氏，是因为王俭的嫡母是武康公主，妻子是阳羨公主。

门第显赫的王俭风姿绰约，当时的士大夫很是倾慕。他担任太学生导师的时候，“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与放效。”（《南齐书·王俭传》）王俭常

常自比为江左风流宰相谢安。

在宋、齐时代，人们都爱好文章，不喜欢经术，学风有些浮躁。王俭力图改变这种风气，他的才学为时人所景仰。在宋明帝时，他曾任秘书丞，主动要求校核坟籍，写成《七志》四十卷，上表献给皇帝，表辞甚雅。梁代的贺纵在《七志》的基础上补了三十卷，写成《今书七志》七十卷。可惜两书现在已经不传。王俭还撰写了《元徽四部书目》，也没有留下来。永明三年（485），齐武帝命王俭在家开学士馆，将国家图书馆所有藏书都搬到王俭家中，“宏览载籍，博游才艺，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沈郁澹雅之思，离坚合异之谈，莫不总制清衷，递为心极。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绝境，不可穷者，其唯神用者乎！”（《全梁文·任昉·王文宪集序》）

在南朝，孝行是士大夫最重要的品德。王俭少年才俊，经人荐举，宋明帝刘彧把阳羨公主下嫁给他。王俭的嫡母武康公主曾经涉嫌太初年间（453）的巫蛊事件，按理不能与阳羨公主做婆媳，宋明帝要求迁葬王俭母亲。王俭私下里以死相拒，改葬最终没有实行。升明二年（478），王俭升任侍中，因为父亲王僧绰在这个职位上过世，王俭坚决推辞了。

王俭六世名德、海内冠冕、风宇渊旷、学识非凡、孝行可嘉，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表率，由他持掌选部，再合适不过了。

二

王俭在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开始任吏部郎，至齐武帝永明七年（489）解选过逝，参掌大选前后持续十二年，发现和提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任昉说他兼具毛玠公之清、李重之识会。

王俭很早就看出萧道成是雄异之才，力保他做了太傅，又拥戴他建立了齐国。梁武帝萧衍最初在王俭的卫将军府做东阁祭酒，王俭一见到他就特别器重，让他做了户曹属。王俭对何宪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梁书·武帝纪》）萧琛才智过人，开始并没有得到王俭的赏识。有一次，王俭在乐游苑宴请宾客，他穿虎皮做的靴子，拄着桃枝做的拐杖，径直坐到王俭身边。通过交谈，王俭十分欣赏他，让他做了丹阳尹主簿。在丹阳尹任上，王俭还在后堂专门接待过袁昂，指着北堂对他说：“卿必居此。”（《梁书·袁昂传》）徐勉十八岁的时候，王俭称他有宰辅之量，常说：“此子非常器也。”（《南史·徐勉传》）何昌宇曾在王俭卫将军府上做长史，王俭对他说：“后任朝事者，非卿而谁？”（《南齐书·何昌宇传》）任昉评价王俭说“一言之誉，东陵侔于西山；一盼之荣，郑璞逾于周宝”（《全梁文·任昉·王文宪集序》）。

齐、梁时期的文坛巨匠，还有很多都曾受到过王俭的提携。江淹刚做中书侍郎的时候，王俭就对他说：“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南史·江淹传》）在丹阳尹任上，王俭提拔任昉做主簿，他十分赏识任昉的文章：“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他自己写了文章，请任昉指正。任昉更改了几个，王俭拍着茶几赞叹道：“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南史·任昉传》）后来人们常说“任笔沈诗”，任



昉的出名，与王俭的提拔有很大关系。任昉十分感激王俭。王俭死后，他为《王文宪集》作了一篇序言。受过王俭知遇的，还有殷臻、伏暉、伏曼容、任遥、谢朓、陆杲、庾杲之、孔檐等一大批文人。

任昉曾对王俭的工作做过评价：“公铨品人伦，各尽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处薄者不怨其少。穷涯而反，盈量知归。”（《全梁文·任昉·王文宪集序》）

三

齐高帝建元二年（480），担任萧齐选职一年左右的王俭要求解选，他上辞呈说：

九流任要，风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谓文案之间都无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闲。虽存自勛，识不副意，兼窃而任，彼此俱壅，专情本官，庶几仿佛。且前代掌选，未必其在代来，何为于今，非臣不可？倾心奉国，匪复退让之与；预同休戚，宁俟位任为亲。陛下若不以此理赐期，岂仰望于殊眷。

王俭说自己虽然颇熟前代旧制，但对于选贤任能之职却不能大胜任。他又说，前朝掌管选事的，未必是固定一个人，为什么本朝非用我不可？显然，这些都是托词。那么，王俭这次解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氏一门两代，王僧绰、王僧虔、王俭都曾担当选职。宋时，江湛要推荐王俭的伯父王微出任吏部郎，王微就回绝说：“天爵且犹灭名，安用吏部郎哉！”他写信给弟弟王僧绰说：“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漠至此，当局苦迷，将不然邪！”（《宋书·王微传》）这几乎是句谶语。权盛一时的王僧绰，最终落得个英年见杀的下场。王俭少年得志，为刘宋驸马都尉，历任刘宋秘书郎、太子舍人、秘书丞、司徒右长史、义兴太守、黄门郎、吏部郎等职。入齐，因功加封为南昌县公、左仆射、领吏部。在众多职务中，吏部郎最为显贵，所谓“九流任要，风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不辞此要职，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王俭的弟弟叫王逊，建元初年（479）为晋陵太守，物议不是很好。王俭担心祸及家族，但让褚渊向齐武帝报告。御史中丞陆澄照章弹劾。齐武帝说：“俭门世载德，竭诚佐命，特降刑书，宥逊以远。”（《南齐书·王逊传》）齐武帝将王逊谪迁到永嘉郡，于半途中诛杀了。王俭在辞呈的开头战战兢兢地说：“臣远寻终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见其伦。”

原来，持盈畏满，担心祸及身家才是王俭这次解选的真正动因。萧道成批准了王俭的辞呈，又要加封他为侍中，王俭坚决推辞，只接受了一个散骑常侍的闲职。

接替王俭担当选职的是侍中、太子詹事何戡。

四

齐武帝永明元年（483），王俭重掌选部，进号卫军将军。齐武帝萧赜十分倚重他：“士流选用，奏无不可。”（《南史·王俭传》）永明二年（484），领丹阳尹、国子祭酒，做了太学生们的老师，王俭的权力到达了顶峰。齐武帝甚至下令把秘阁藏书都搬到王俭的家里，让他在家里授学。王俭集教育、擢拔于一身，一时间，宾客盈门，众文士趋之若鹜，“时人呼入俭府为芙蓉池。”（《南齐书·庾杲之传》）对于有才华的文士，王俭都十分提携，甚至不计其出身。任昉说：“虽单门



后进，必加善诱。勸以丹青之价，宏以青冥之期。”（《全梁文·任昉·王文宪集序》）

永明六年（488），正处在事业顶峰的王俭上表向齐武帝提出解选。王俭为什么要第二次辞去选职呢？

永明三年（485）六月，王俭的叔叔，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薨。王俭的家庭势力减弱，必然要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但这并非王俭此次解选的主因。

对王俭选拔官员的独立性权构成较大干扰的，是一些寒门出身的幸臣。他们逐渐进入南朝齐的政治中心。永明元年（483），小吏出身的茹法亮被封为龙骧将军，永明二年（484），又加封望蔡县男、转给事中，羽林监，永明三年（485），入为中书通事舍人，权势更加鼎盛。王俭常常对人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邪！”（《南史·茹法亮传》）与茹法亮并为中书舍人，备受齐武帝亲幸的，还有吕文度、吕文显等人。这些人不但掌握着兵权，还频频插手吏部事务。越州的长官出现空缺，吕文度推荐了自己的好友费延宗，齐武帝当即让费延宗做了越州刺史。永明年间（483—493），齐武帝这些亲信干预吏部的情况十分普遍，以至齐武帝不得不颁布一道命令：“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南齐书·吕文显传》）

直接导致这次解选的关键人物是文惠太子萧长懋。王俭曾为太子詹侍中，与文惠太子有“师友之义，穆若金兰”。（《全梁文·任昉·王文宪集序》）历来多病，体格臃肿的萧长懋长期深居东宫，一般不大出行。但这并不表明他很安份，太平景象有后面，藏着很深的阴谋。自永明元年（483）萧长懋被立为太子起，不但礼接文士，还暗地蓄养武人，玩弄羽仪，多所僭越。永明数年中，二宫兵力充实，太子使官中将士更番役筑，宫城苑巷，制度之盛，观者倾京师。齐武帝晚年喜欢游宴，诸多朝政由太子省视。太子不露声色地把一些亲信安插在朝廷的多个机构当中。政变一触即发。

永明五年（487）冬，文惠太子亲临王俭主持的国学视察，其名是来策试诸生，其实是想试探一下王俭的态度。太子问：《曲礼》上说的“无不敬”，下级对上级当然要尊敬，上级对下级是慈爱而非尊敬。在场的王俭、紫金光禄大夫张绪、竟陵王萧子良、临川王萧映都不同意太子的观点。太子又问：“《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相主？”王俭答：“乾健震动，天以运动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又问：“天以运动为德，君自体天居位，震雷为象，岂体天所出？”王俭答：“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万物出乎震，故亦帝所与焉。”（《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太子以《周易》试探，王俭谨慎作答，一方面肯定太子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提醒太子的一切都是皇帝所赐。最后，还引《孝经》中曾子侍孔子的事理，婉转地劝谏太子尽孝。

在永明“市朝晏逸，中外宁和”（《南齐书·武帝纪》）的假象之下，激流涌动。文惠太子与齐武帝亲信暗地角力，咄咄逼人。为了不再遭受父辈那样的灾祸，除了退出这场政治游戏之外，王俭别无选择。

于是，他把球踢到齐武帝那里，向齐武帝递交了辞呈。

齐武帝没有批准这个辞呈。

五

在内外交困中，王俭的选职实际上无法继续做下去了。永明七年（489）四月，王俭坚决要求辞去选职：

臣比年辞选，具简天明，款言彰于侍接，丹诚布于朝野，物议不以为非，圣心未垂矜纳。臣闻知慧不如明时，求之微躬，实允斯义。妄庸之人，沈浮无取，命偶休泰，遂践康衢。秋叶辞条，不假风飙之力；太阳躋景，无俟萤爝之辉。晦往明来，五德递运，圣不独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时，而叨其位，常总端右，亟管铨衡。事涉两朝，岁绵一纪。盛年已老，孙孺巾冠。人物徂迁，逝者将半。三考无闻，九流寂寞。能官之咏，辍响于当时；《大车》之刺，方兴于来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贵，四辅六教之华，诚知匪服，职务差简，端揆虽重，犹可勉励。至于品藻之任，尤惧其阻。夙宵罄竭，屡试无庸。岁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尘及国。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竞爽，选众而授，古亦何人。冒陈微翰，必希天照。至敬无文，不敢烦黜。

在这封辞呈中，他说自己这两年连连辞选，实在是诚心诚意。他在宋、齐两朝担任选职差不多有十二年，已经心力憔悴，“盛年已老，孙孺巾冠。”吏部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三考无闻，九流寂寞。能官之咏，辍响于当时；《大车》之刺，方兴于来日。”曾有芙蓉池盛誉的王俭府，竟然落到“人物徂迁，逝者将半”的凄凉境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慕名而来的文士们纷纷离开了卫将军府。谢朓跳到了文惠太子府，做起了太子舍人，萧衍、庾杲之、任昉都投到了竟陵王萧子良府。文惠太子和竟陵王招士，已经使太子府和齐武帝亲信之间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王俭几乎被架空了，吏部对官员的遴选、考评与任用都陷入了瘫痪状态。王俭被逼上了绝路！

这一次，齐武帝批准了王俭的辞呈，同意他辞去吏部的官职，但加封他为中书监，依旧要参掌选事。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不在其位，还能谋其政吗？

一个月之后，王俭就溘然长逝，享年三十八岁。他一生清心寡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

这位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选官，终于以死亡的方式解下了身上的重担。朝廷更替也好、家族兴衰也罢，王俭以显赫的身世为保证，以学养和人格为表率，与王权抗争，与群小周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持选贤举能的独立性，“提衡唯允，一纪于兹，拔奇取异，兴微继绝，望侧阶而容贤，候景风而式典”。

他，耗尽自己的生命，捍卫着士人的理想与传统。这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

余光煜



班固所著《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的成书年代晚于《史记》，却比《史记》难懂。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汉书》中多用古字古词，这与《史记》习用通俗浅近的话语的风格恰恰相反；二是班固素有近骈对偶的文风，这又和《史记》文章近散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反差；三是班固在沿用《史记》材料时为追求文字典雅，喜欢省字。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汉书》的文字比《史记》更显得古奥艰深、晦涩难懂。即使是被《后汉书》誉为“才高博学，为世通儒”的马融尚需从班固之妹班昭受读《汉书》，其解读之难可想而知。正因为《汉书》的难懂，在班固身后，注家纷起。据颜师古自撰的《汉书叙例》介绍，就在《汉书》成书后不久，已有注本出现。自汉桓帝时，延笃即为之作注，但未能流传下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出现了晋灼、臣瓚、郭璞等注者共有二十余家。这一时期注家虽众，但大都说法互异，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因而阅读《汉书》的困难并未完全解决。

到了唐代，颜师古作《汉书注》，这种注释纷乱的情况才得以改观。颜师古，名籀，以字行，琅琊临沂人。其祖颜之推、其父颜思鲁都以儒学著称。由于家学的影响，颜师古博览群书，善写文章，尤精训诂，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流传于世，影响较大。颜注《汉书》采取“集注”的形式，广泛征引唐代以前23家注释，并加以删改、补充、折中润色，进而发展成为卓然一大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颜师古《汉书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藉此说明颜氏《汉书注》对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的重要价值。

一、对字词句的训释

颜氏《汉书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因而颜注对《汉书》的注释重视对文字词句意义的推求和说解。本书诸多说字解词的注例主要是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加以注释。和前人相比，颜对字词的训释系统而深入，主要表现在辨别字形、自成体例；注释音读，目的明确；说解语义，形式多样。

首先谈辨别字形。颜注说解字形，不同于《说文解字》之类的字书评析字形以辨析字义的方式，主要是采用“某，古某字”这种注释形式，用唐人能看懂的通用字来训释书中那些非通用字。颜氏所谓的“古字”并非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字。杨树达在《汉书窥管》中指出，按颜所云之古字，多不可信。也就是说，颜注中的“古字”和今天指称的“古字”并不相等，倘若用今天的概念去检测颜注中的“古字”，当然“多不可信”。但不论是初起字、异体字，还是通假字，相对于唐人而言，大多已不常用而仅存在古籍中，颜氏混言之谓为“古字”，又不足为怪。具体分析这类注例，被注字与注释字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被注字是初起字，颜氏用后起字注释。这种关系即今天所说的古今字。例如《高帝纪下》：“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郑氏曰：“县音悬。”颜注：“此本古之悬字也，后人转用为州县字，乃更加心以别之，非当借字。他皆类此。”县（悬）原本是个会意字，像绳悬首倒挂之形，后因借作州县字，久借不归，才又造出（悬）字作悬挂义。被颜注简要地说明了《汉书》中所用字县与唐人常用的悬之间的关系。二是被注字已不常用，颜氏用唐人常用的另一种写法的字来注释。两字的关系即今天所说的异体字。例如《昭帝纪》“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砮命击益州，大破之……。”颜注“砮，古奔字耳”。砮是个会意字，象牛惊走之形，表示跑得快。奔字，《说文·夭部》：“走也，从夭，贲省声。”段注本改作卉声，均误。容庚《金文编》认为“从夭，从三止，奔之意也”。按容庚说，奔实际上也是个会意字，砮与奔是从不同角度会意而产生的异体字。颜注揭示了这种关系。三是被注字是个通假字，训释字是这个通假字的本字。这两字的关系是通假字和本字的关系。颜注揭示了这种关系。

再谈注释音读。《汉书注》十分重视注音，注音例在所有注文中有很大的比重。下面我们从其形式和目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注音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用直音法注音。如《项籍传》“汉军畏楚，尽走险阻”，颜注“走音奏”。二是反切注音法。例如《贡禹传》“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颜注“重音直用反”。颜注中反切例远比直音例和下面谈及的拟音例多。三是比拟标音法。比拟标音法是用音读相近的字来比拟被注字的读音，常用“读如、读若、读曰、读为、读与某同”等几种术语表示，而其间又尤以“读曰”用例最多。例如《成帝纪》“古之选贤，傅纳以言”，颜注“傅读曰敷”。

注音的目的，颜师古自撰的《汉书叙例》说得很清楚：“字或有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这就告诉我们，常用字不作注音。同一字反复注音，不嫌重复是为了方便，免得东翻西找。颜氏注音的目的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单纯注音。《王莽传》“相威将军李蒸”，颜注“蒸音所林反”，“蒸”字生僻难识，故以反切注出其音。《古今人表》“祭公谋父”，颜注“祭音侧介反”。《朱云传》“小臣居下讪上”，颜注“讪，谤也。音所谏反，又音删”。“讪”有平、去二读，意义无别，颜注点明之。二是以注音区别意义。《汲黯

传》“群臣或数黜”，颜注“数，责也，音所具反”。《元后传》“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颜注“数音所角反”。前例“数”表责备义，后例“数”表屡次义，二义读音不同，故颜氏以注音别之。三是以注音辨识假借字。颜氏所处的时代虽未建立假借字的概念，但对借字、本字的区分还是有一定认识的。颜氏通过注音指出借字的本字。例如《渠传》“汉极大，然不能饥渴”，颜注“能音耐”。《王莽传》“莽拜钦为填外将军”，颜注“填音竹刃反”。前例颜注说明能是耐的借字（二字古音相近），这种能借作耐的用例在《汉书》中屡屡出现。《食货志》“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赵充国传》“汉马不能冬”，这二句中能都是耐的借字。后例颜注认为填塞之“填”字应当看作读竹刃反的“镇”的借字，注音用的是反切方式，填音徒年切，与读为竹刃切的镇字相通，反映了上古音向中古音演变过程中的规律。颜氏虽未标出本字，但用意是清楚的。颜注还常常用“读曰”“读与某同”等术语来揭示本字。《韩安国传》“临江（王），适长太子，以一言过，废王临江”，颜注“适读曰嫡”。《高后纪》“上将军禄、相国产颡兵秉政”，颜注“颡读与专同”。读颜注，可以知适为嫡的通假字，颡为专的通假字。

二、对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

《汉书》内容丰富，它涉及到西汉一朝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朝代相隔，年代久远，政治制度、社会习俗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特定的指称，或废而不用，或用作表示别的意思。单看原文，书中所涵括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就不易为后世读者所了解。颜氏注意到古今殊俗的情况，在注语中对名物、典制、史实等文化方面的考证说解甚详。综合这些注释，实际上就是对秦汉文化的介绍说明，对正文史料起到了补充阐释的作用，进而成为我们后世了解秦汉社会生活真实情况的重要线索。

颜氏所作的第一类工作，是对人名地名作出注释。《古今人表》“齐禽敖”，颜注“即黔敖也”。“禽敖”之名人们感到陌生，颜注出异文为“黔敖”，即《礼记檀弓下》记载的“齐大饥”而“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的“黔敖”，“禽敖”其人人人们就了解更多了。《匈奴传上》“使当户且居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颜注“当户且渠者，一人为二官。雕渠难者，其姓名”。这解释少数民族人名，助于人们了解。为了帮助人们对史实有更为准确的了解，颜氏给地名作注。

《司马迁传》“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颜注“会稽，山名，本茅山



颜师古撰等慈寺碑

也，禹于此会诸侯之计，因名会稽”。《武帝纪》“望祀虞舜于九嶷”，颜注先引文颖曰：“九嶷山半在苍梧、半在零陵”。接着引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苍梧冯乘县，故或云舜葬苍梧也”。然后颜氏自己注曰：“文说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峰，形势相似，故云九嶷山”。颜氏对人物、地名的注释，指出古今异名，古今不同隶属，介绍地名来历及相关的人文背景，这大大提高了注语的价值。

颜氏所作的第二类工作，是对《汉书》中涉及的礼仪制度进行补充说解。《武帝纪》：“令天下大酺五日，五日，祠门户，比腊。”腊是祭名，颜氏引苏林注已解说，而颜氏自注：“腊者，冬至后腊祭百神也”。《孝平王皇后传》“太后不得已而许之，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颜氏注：“纳采者，《礼记》云婚礼纳采问名，谓采择其可者。”颜注解说了文中出现的礼制名称。《汉书》中有《礼乐志》《郊祀志》讲解礼仪，各篇中讲解礼仪的文字也不少。尽管如此，颜氏还是就书中可能存在的疑点加以解释，力求说明清楚。如《昭帝纪》“（始元元年春二月）己亥，上耕于钩盾弄田”，颜氏引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颜氏自注云：“弄田为宴游之田，天子所戏弄耳，非为昭帝年幼创有此名。”颜氏为避免应劭注造成的误会，补充说明弄田为宴游之田，不是因为昭帝年幼才称作弄田，意指弄田是汉时旧有。虽有戏弄之义，但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对天子躬耕劝农的重视。颜氏对礼仪制度的说解，有助于我们对汉代礼仪进行研究。

颜氏做的第三类工作是对职官制度加以解说。颜注对职官的注释主要涉及官职、爵位、属吏、司职、俸禄、选拔官吏及考核方法等诸多方面。如《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定敬侯齐受以卒从起留，以家车吏入汉。”颜注对“家车吏”一职作出了解释：“主汉王之家车，非军国所用。”颜注对官吏的假、守也颇有涉及。如《项籍传》“乃相与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颜注“未得怀王之命，故目为假也”。《平帝纪》“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颜氏引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赐真。”颜氏自注云：“此说非也。时诸有试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当试守也。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前例颜注指出职守上加“假”，应指未获正式任命。后一例，颜、如二说虽略有不同，但官吏有“守”和“真”的区别，官吏有试守的制度，两人说法是一致的。“真”，意指正式的，而“守”或“试守”是指代理的、试用的。两者在俸禄上有区别，只有转为真之后才能得到满秩，即领到全部俸禄。要了解汉代的职官制度，颜注是不能忽略的宝贵资料。

颜注还在解释刑法、说解典籍、补充说明历史事实上做了很多工作。《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颜注：“墨，黥也，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刖，断足也。杀，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职也。”颜氏几乎对《汉书》中涉及的各种刑法都加以说解，上例即是对五种刑法的解释。《高帝纪上》：“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颜注：“族谓诛及其族也。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汉书》中有《艺文志》，颜氏对《艺文志》与其他纪、传中涉及典籍方面的知识也多有介绍和说解。《艺文志》“《周官经》六篇。”颜注：“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周官经》即今《周礼》，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莽时刘歆任国师时立《周官经》以为《周礼》。颜氏在注中指出，书中《冬官》部分已经亡佚，以《考工记》充作《冬官》。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也指出，汉代孝文帝时求得《周礼》，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孔、颜二人均是唐人，生活时代相去不远。他们的这一说法，为后人研

究《周礼》一书，提供了一份资料。《艺文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注：“非今所有《家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有“《孔子家语》十卷”。颜氏注语，当是指出《家语》系伪作的较早材料。颜氏在注中多有揭示史实的文字，这种补充说明为我们阅读提供了方便。《儒林传》：“（孔子）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颜注：“匡，邑名，即陈留匡城县。孔子貌类阳货，阳货尝有怨于匡，匡人见孔子，以为阳货也，故围而欲害之。后得免耳。厄陈，谓在陈绝粮也。”有了颜氏的解释，《儒林传》中的文字就显得翔实多了。

三、对旧说的取舍和补正

我们所见到的颜师古《汉书注》，其中引用了很多前人的材料。颜氏在《汉书叙例》中介绍自己注书体例时称说：“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祇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结合其《叙例》，综观全书，颜氏采用的是集注的形式。书中广泛征引了诸家旧注。书中的注例，一些是对前人旧注的直接援引；一些是列举前人的注音释义之后，颜氏辨析其对错，错的进行纠谬，不足的为之补充，注释不明的进一步为之说解。还有一些则是颜氏自己的释语，对于那些颜氏也不能确定对错的，则把异说或疑问具存。凡是“师古曰”以下，大都可以看到颜氏在前人基础上的删改、修正和补充。正是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科学态度，使得颜氏的《汉书注》成为《汉书》最重要的注本之一。

颜氏对旧说的取舍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择保留旧注。《汉书注》中广泛征引了唐代以前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玄、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臣瓚、郭璞、蔡谟等二十余家的注释，大量前人的注释藉此得以保留。从中可以略窥前代对《汉书》的研究概况。应劭为东汉末期的人，《汉书注》中保留应氏的反切注例，例如《地理志》中“梓潼”，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浹反”，“道”，应劭注：“故侯国也。音蒲北反”；“罕”，应劭注“音羌肩反”；“沓氏”，应注“氏水也。音长答反”。这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反切注例，说明早在东汉末期，利用反切注音读的方法就已经出现，但应用并不广泛。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语音发展的历史很有价值。颜氏对旧注的保留，更明显而集中地体现在《天文志》的注例中，《天文志》的注例，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颜师古旁征博引以及不知阙如的科学态度。

二是补充推衍旧注。有些旧注虽然注语不误，但语辞不明或说解上有缺漏。颜氏即在征引旧注之后再加自己的注语，或为旧注注音释义，或对旧注的缺漏加以补充，使得那些语辞不明或语焉不详的旧注更为清晰明了。例如：《惠帝纪》“孝惠皇帝”，荀悦曰：“讳盈之字曰满。”应劭曰：“礼谥法‘柔质慈民曰惠’。”颜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臣下以满字代盈者，则知帝讳盈也。他皆类此。”此例颜氏照引荀氏所注避讳之字和应劭所注谥法，但旧注对惠帝谥号之前的孝字未加以注释，颜注补充这一缺漏，并为荀注避讳加上说明。《韩延寿传》“鼓车歌车”，孟康曰：“如今郊驾时车上鼓吹也。”颜注：“郊驾，郊祀时备法驾也。”“郊驾”也不是原文中的用语，而是孟注中的语辞，颜氏为之作注。这恐怕与唐代注疏体例的兴盛有密切关系。

三是对旧说的匡正纠谬。为《汉书》作注，颜氏非第一人。从汉至唐，原书文

字又往往在传写过程中出现不同钞本的文字讹舛。对旧注以及俗本中与颜氏所据《汉书》相异的文字，还有班固原文中的语辞，都可视之为旧书。颜氏对旧说中的错误进行了匡正纠谬的工作。对旧误的纠正大体又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旧有注释纠谬；二是对《汉书》传写过程中产生讹误的匡正；三是对《汉书》原文的文字错误的辨析。这里只谈第一个方面。例如：《昭帝纪》“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如淳曰：“元服，谓初冠加上服也。”颜注：“如氏以为衣服之服，此说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传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谓冠为元服。”颜氏对如淳关于元服的释义进行纠谬，并引本书别的纪传中的文字作为旁证。此为旧说释义例。《高帝纪下》“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荀悦注：“唐者，帝尧有天下号。陶，发声也。”韦昭注：“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臣瓚注：“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颜注：“三家之说皆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之矣。”该注例中，荀悦、韦昭、臣瓚三人对陶唐都有不同的释义，但颜氏据《说文》所引《夏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对旧注进行纠谬。《王贡两龚鲍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颜注：“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颜氏认为注家对商山四皓的说解都属不经之谈，四皓之名也均不可靠，因而摒弃诸说，无一征引。这说明颜氏作注在广搜博采的同时，取舍非常慎重。此为对众说的舍弃。

从沂蒙起家的赤眉军

Zhangliang9137



樊崇画像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已无法调和，王莽“改制”失败，豪强肆虐，民生凋敝。百姓走投无路。公元18年，琅邪郡人樊崇在莒（今山东莒县）揭竿而起，会同同郡人逢安，东海郡人徐宣、谢禄、杨音，聚集本地子弟达数万人，以泰沂山区一带为根据地，把眉毛涂红为标志，号称赤眉军，拉开了西汉农民起义的大幕。

在王莽统治后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名的队伍就有十几支，其中比较强大的是绿林和赤眉。

两汉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但有男英雄，还有女英雄。王莽天凤元年，琅邪郡海曲县（今日照）有个女子人称吕母，儿子被县令冤杀，她散尽家财，召集轻侠少年，发动了起义。吕母自称将军，起义军有数千之众，全部集中在海上。他们突袭海曲，杀掉县令，而后仍然退回海上。

几年后琅邪人樊崇起兵，开始只有一百多人，活动在泰山一带。由于樊崇为人仗义，作战勇敢，一年下来队伍达到了一万多人。此后，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相继



起兵，他们合兵一处，达到数万人，进军徐州，打败了王莽的探汤侯田况，又回到青州，仍然以泰沂山区为根据地。

应该承认，从整个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来看，赤眉军是组织得比较好的。从开始起义，到建立政权，到最后投降，在他们这五个人的领导班子中始终没有发生自相残杀的内乱，在这里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樊崇和徐宣。樊崇这人非常勇猛，为人宽厚，做事仗义，深得人心；徐宣有文化，会《周易》，比较有远见，光武帝刘秀说他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赤眉军的各位领导人都比较注重个人形象，强调以德服人，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分财产的时候先人后己，他们缺乏的是治国安邦的政治战略，他们只是为了弄碗饭吃才铤而走险的，所以樊崇等人一直没有安抚地方的想法，只是与部下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官最大的称为三老，其次是从事，其次是卒史，其他人以巨人相称，这些都是西汉时期基层官吏的名称。

赤眉军中有一种平等的精神，他们生活在真诚、侠义和友好之中，彼此无私互助，说起话来开诚布公。因此在赤眉军和王莽军队的战争中，赤眉军占据很大优势，打败了廉丹、王匡率领的王莽中央军，长期掳掠青州、徐州、颍川、汝南一带，一直没有向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发动进攻。

绿林军中的更始皇帝刘玄定都洛阳之后，樊崇带领20多位将领来到洛阳，归顺更始政权，被封为列侯。说实在话，这是安抚赤眉军的绝好机会，但是刘玄等人真不是做事的人，一点政治远见都没有，他们没有对赤眉军这样一支相当强的军事力量作出安排，以至于樊崇等人重回旧部，为了生存只好继续掳掠。此时赤眉军分成两部，樊崇、逢安为一部，攻下了长社，威逼宛城；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攻下了阳翟，进逼梁国。樊崇等人认为如果东归，将士们势必四散回家，不如向西进攻长安。更始二年，赤眉军两路都进入了关中，会师弘农，与更始政权作战，连战连胜，人数达到了30万。

赤眉军中有个齐国的巫师比较有见识，利用祭祀城阳景王的机会，说：“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更始皇帝的叛将也劝说樊崇立刘氏宗亲为皇帝，然后征伐四方。樊崇认为有道理，于是立刘盆子为皇帝，自号建世元年。

刘盆子是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人，王莽的时候他家的封邑被废除，赤眉军把他和他的两个哥哥刘恭和刘茂掳掠到军中。后来一起到了长安。刘盆子和刘茂仍然留在赤眉军中，刘盆子的日常工作是放牛，年仅15岁。等到樊崇想立刘姓子孙为皇帝的时候，发现城阳景王的后代有70多人，最亲近的是刘盆子等三人，怎么办呢？赤眉军做事相当公平，抽签。刘盆子年龄最小，最后抽签，结果抽中了，大家赶紧朝拜，差点把孩子吓哭了。人们给他配备了车马，换上了好衣服，吃上了好饭，相处的仍然是原来那群牧牛的朋友。

徐宣识字，当了丞相，樊崇仗义，当了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杨音大司农。赤眉军进军高陵，联合更始叛将张卬，攻入了长安，更始皇帝刘玄投降。赤眉军进长安，还不如李自成进北京呢，土匪气仍然浓厚，士兵大肆掳掠，老百姓据堡自守，三辅县令进献财务，被士兵劫掠一空。刘盆子设宴大聚群臣，大家三一群俩一伙，一点队形都没有，气得杨音按剑大骂：“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殍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最后发展到士兵冲进来抢夺酒肉，不得不杀掉100多人，才镇住了场面。

刘盆子在官中日夜哭泣，根本不管外面的事情，宫中女子饥饿难忍，刘盆子还给她们分发一些粮食。此时哥哥刘恭也在长安，他认为赤眉军必定失败，这个皇帝不当也罢。刘盆子对樊崇等人说：“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

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樊崇等人也觉得不太好，纷纷承认错误，把刘盆子抱起来，玉玺和绶带重新带上。各位将领回营后，闭门自守，整顿纪律，社会秩序明显好转，老百姓都夸天子聪明。

可是，赤眉军的给养几乎全靠掳掠，20天后又出来抢劫了。长安附近的粮食已经没有了，抢也抢不着了，于是放火烧了皇宫，引兵继续向西。此时，赤眉军达到最盛，号称100万人马，打败了更始旧将严春，进入安定、北地，天降大雪，坑谷皆满，士卒冻死很多，被迫回师，发掘西汉皇室的陵墓，盗取其中的宝物，奸污吕后的尸体，只有汉文帝的霸陵和汉宣帝的杜陵幸免于难。汉文帝提倡节俭，霸陵中没有东西，汉宣帝改善民生，赤眉军原来都是老百姓，不忍发掘。

实际上早在赤眉军进军关中的时候，已经在河北站稳脚跟的刘秀就派邓禹尾随其后，试图坐收渔翁之利。赤眉军西进后，邓禹进占长安，没想到赤眉军又回来了，邓禹不舍得放弃长安，出兵迎战赤眉，被打得大败，被迫退出长安。汉中延岑兵出散关，赤眉军派逢安率领10万人进攻延岑，邓禹认为有机可乘，再次进攻长安，正好碰上谢禄的救兵赶到，邓禹再败一仗。赤眉军有点类似秦末农民起义军，他们是无畏的勇士，为生存而战，属于光脚的，不管是王莽，还是更始皇帝刘玄，亦或光武帝刘秀，他们都是穿着鞋的，想打败赤眉军都比较难。刘秀事先曾经嘱咐邓禹不要急于与赤眉开战，要在饥寒交迫中消耗他们的锐气，邓禹理解得不好，以至于连遭两败。

赤眉军实际上是一群武夫，要想打败他们应该用计，首先做到这一点的是延岑和李宝。延岑和李宝用兵数万人，和赤眉军逢安部一战，阵亡一万多人，李宝被迫投降，延岑溃不成军。但是赤眉军不辨真伪，此时李宝派人告诉延岑可以再战，他做内应，结果大破赤眉，10万多人被杀，逢安只和数千人退回了长安。此时长安城经过反复战乱，城郭皆空，白骨遍野，几乎成了鬼城，赤眉军根本抢不到什么东西了，被迫向东，尚有20多万人马。此时赤眉军也就是走哪儿是哪儿，活一天是一天了。

光武帝刘秀的战略水平，比樊崇、徐宣等人整整高出一个段位，他深知赤眉军战斗力极强，所以做出了周密的部署。汉军侯进部进占新安，耿弇部屯兵宜阳，刘秀告诉他们：“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目的就是以逸待劳，半路截击。邓禹再次进攻赤眉，结果第三次败在赤眉手下，冯异比较老辣，他派一部分士兵化装成赤眉军，大破赤眉于崤底，俘获赤眉数万人。刘秀抵达宜阳，亲自指挥北方突骑，这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机动部队。

赤眉军来到宜阳，早已饥寒交迫，背后有冯异的追兵，前面是刘秀的大军，赤眉派刘盆子的哥哥刘恭出来请降。刘恭对刘秀说：“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刘秀深知赤眉军就是一群走投无路的老百姓，生活所迫走上了劫掠四方的道路，他说：“待汝以不死耳。”对于樊崇等人来说，当初起义就是为了活着，兵进长安也是为了活着，现在刘秀保证他们不死，这也就达到目的了，能活着就行，赤眉军全军缴械投降，刘盆子把传国玉玺交给了刘秀，刀枪剑戟堆积得像山一样。

刘秀命令悬厨造饭，几个月来，十万赤眉军第一次吃了顿饱饭。第二天，刘秀在洛水边检阅军队，让刘盆子君臣一同观看。刘秀对刘盆子说：“自知当死不？”刘盆子回答说：“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刘秀大笑，说：“儿大黠，宗室无蚩者。”刘盆子的善良聪明立马得到了刘秀的认同。

刘秀又对樊崇等人说：“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此时徐宣理解得比较好，他说：“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是啊，刘秀建立的是新的统治秩序，重点是安抚民众，让人们承认这种新秩序，这才是天命所归。赤眉军不管多么能征惯战，事实上他们根

本没有政治理想，就是一群亡命徒，只会骚扰民众，也无法建立统治秩序，他们终究会走向失败，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

刘秀又说：“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灶。然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刘秀是个讲究品德的人，在他看来，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很好的品行，立君能用宗室，这说明没有篡汉之心，比王莽强，赤眉军因生活所迫值得同情。

赤眉军部众全部被遣返家乡，务农生产，成了东汉的编户齐民。首领们被留在洛阳，每人一套住宅，二百亩土地，让他们过上了小康生活。后来樊崇、逢安谋反被杀。杨音在长安时和赵王刘良关系不错，被赐爵关内侯，和徐宣一同衣锦还乡了。刘恭杀掉了谢禄，为更始皇帝刘玄报仇，自己投案自首，光武帝没有治罪。刘秀对刘盆子很好，赏赐颇丰，后来刘盆子生病失明，刘秀在黄金地段建造商铺，让刘盆子吃房租，一直到死。



赤眉军无盐大捷

从原始材料看张灵甫被击毙细节

张国新

对于1947年国民党军队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击毙的描述，华东野战军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有关指战员的回忆著作、人民解放军军史著作、中共党史著作，以及台湾方面的相关著作等，至今描述各种各样，迷雾重重。近两年，国内有不少期刊仍然在刊发“考证”文章。我拜读后，还是如坠云里雾里。

近日，找出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编印的一本小册子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发的一本大开本资料集，收录有几篇人民解放军战地记者1947年5月描述孟良崮战役的文章以及图片资料。仔细研究，发现这些原始资料对搞清楚张灵甫被击毙的情况，颇有帮助，故摘录于下。

《孟良崮大胜》：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我陈毅、粟裕、谭震林诸将军麾下之人民解放军，在坦埠（蒙阴以东五十里），以南山区向进犯之蒋嫡系主力七十四师举行反击”，“至十四日将其包围于孟良崮大山中，我军于十五日午后发动总攻，激战至十六日午时完全解决战斗”。“综合此役伟大战果：共俘获蒋军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魏振钺，五十一旅少将旅长陈传钧，少将副旅长皮宣酋，五十七旅少将旅长陈云等以下官兵一万九千六百余名，毙伤蒋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以下官兵一万三千余名，缴获大小炮数百门，轻重机枪三千四百六十八挺，步枪六千九百七十七支，坦克五辆，战马一千三百余匹，其他武器甚多”。

评析：这段材料笼统描述了张灵甫是被击毙的，不是被击伤后死亡的。但看不出张灵甫到底是怎样被击毙的。



《蒋军七十四师覆灭经过》：“十五日晚，解放军向被围于孟良崮群山之蒋军七十四师发起总攻”，“十六日拂晓，又攻克六零零高地”，“解放军攻山部队，已攀登峭壁悬崖，控制孟良崮所有制高点。敌七十四师已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即成批放下了武器，敌师长张灵甫于突围时被击毙，与其近万官兵一起葬身孟良崮。七十四师乃告全军覆没。”

评析：这段材料描述了张灵甫“突围时被击毙”。但看不出是“从山洞里往外冲时被击毙”，还是“在山洞外组织突围时被击毙”。不过，明确说明了“是当时被击毙”，不是被击伤后死亡。

《蒋匪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涟水战役，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损失惨重。张灵甫对左右说：“一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今春七十四师由苏入鲁，张灵甫眼看到蒋军第一快速纵队、二六师、五一师分别在兰陵、峄县、枣庄相继就歼，知道风头不对，不知有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因此，假托生病向蒋介石提出‘身体不好，要求休养’，但未批准。张灵甫毕然有些眼光，果然不出所料，像癞皮狗一样的死了。”“至于‘无葬身之地’云云，未免担忧，因人民解放军一本宽大为怀之旨，妥为打殓矣。”

“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第一个美械师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沂蒙山孟良崮歼灭战之第四天（十六日）当蒋军七十四师师部就歼时，张灵甫妄图突围逃生，人民解放军的美造汤姆机枪挡住了他的去路，弹中张氏后脑而死。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伤，血管与脑浆均已干枯，长方大脸，鼻高大身材魁梧，右腿曾因伤残废，较左腿为细瘦，尸体已开始腐臭，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按张灵甫四十三岁，陕西长安人，保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曾历任营、团、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个性强暴，崇拜拿破仑、希特勒，对下管制甚严，为蒋介石所钟爱的心腹干部，亦为美帝国主义所喜爱培植的得意走狗。如今美械美训之七十四师全军覆灭，张灵甫亦未能身免，不知蒋美作何感想！？”

评析：这段材料对张灵甫被击毙的描述，比较细致，与其他描述不一样。强调张灵甫是在“妄图突围逃生”时被汤姆枪击毙，不是被炸死在山洞，更不是被击伤后死亡，且在“尸首查出后”作了“辨认”。参与辨认的，是熟悉张灵甫的、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或其侍从人员。这段材料描述说，张灵甫是脑部被炸伤因“血管与脑浆均已干枯”而死亡，且“尸体已开始腐臭”。说被发现时张灵甫“血管与脑浆均已干枯”而死亡，应该说得通，但说“尸体已开始腐臭”，不易理解。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发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一书记载：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敌人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企图压迫我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我乃集中全部主力，选择敌人中路之汤恩伯集团中最突出于蒙阴以东的整编七十四师，加以猛烈的围攻，从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将其全歼于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共毙伤俘敌三万二千余人，该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七十四师被歼后，进犯鲁中之敌即全线溃退。

评析：在这本大开本书中附有当时张灵甫被击毙的照片以及孟良崮战役的五张图片。张灵甫被击毙的照片说明是：“蒋匪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军击毙”。从这些照片看，张灵甫被击毙的情况与《蒋匪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一文描述一致。

一言以蔽之，以上关于张灵甫被击毙的原始资料值得重视。

画说于腾 (中)

高 雷

二、藏品的流向

让临沂人窝火得是于腾偌大一份宝藏化为了乌有，不仅没有眼福而且还不知情。

岂不知收藏不仅是知识的较量，更是财富的打拼。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流失的过程，其中的艰辛，其中的愉悦，其中的忧伤，“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虽然“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但情感不能代替理智。

于腾的收藏，不知凡几，大致去向清晰，让临沂人无须自责的是，于腾家庭绰有余裕，不用卖画维持生计，其藏品在四川任上大部已经做了处理。我们今天把于腾定位为收藏家，其实有违于腾“学而优则仕”的初衷，他是个传统官员，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藏品在他手里首先是工具，其次才是玩物。这样才能理解于腾。

于腾所藏字画的流逝可从时间上分为生前与身后，生前主要是打点官场、结交权贵；身后就有点复杂了。

于腾未发达时，家境贫寒，收藏字画是他出任四川宜宾县令后的业余雅好。清末官场黑得很，县分大小，人有远近，明朝不明，清朝也不清。于腾为官几十年，由宜宾县令转任铜梁县令，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到灯红酒绿的重庆府附近，再升任天府之国首府成都知府，不打点官场，孝敬上司，大约寸步难行。从流传有序的字画题跋，收藏印章看，于腾孝敬最多的是丁宝桢。

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镇人，字稚璜，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军功卓著相继任岳州、长沙知府；同治五年（1866年）调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晋级巡抚。1869年秋以智斩慈禧宠宦安德海而名扬天下。1868年丁宝桢奉诏勤王，率军一日百里急行军，大胜，解北京之危。同治皇帝在惊魂初定之后，一连下了7道圣旨，嘉奖他的武勇忠诚。清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57岁的丁宝桢受到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接见。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国之宝桢”，被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挂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升任四川总督。光绪十三年（1886年）卒，谥“文诚”，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说句题外话，丁宝桢属淮军悍将，同大多湘军、淮军将领一样又是科举出身，这是一



《海棠蛱蝶图》 南宋·佚名



《白蔷薇图》 南宋·马远

个很特殊的现象，他有文化，有气魄。敢杀安得海，让曾国藩、李鸿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见此人手段。

于腾敬献丁宝桢的字画多幅，均钤有于腾的收藏章：其中部分亦有丁宝桢幼子丁伯川的鉴赏章。

如南宋佚名《海棠蛱蝶图》，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24.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画面描写一枝海棠迎风摇曳，蛱蝶翩翩起舞于海棠花枝间。画风工整，敷色浓艳，用笔沉稳，画叶用颜色层层渲染，阴阳向背都交代得十分细致精到，体现了精密不苟的时代审美趣味，为南宋花鸟小品画中的精品。

本幅无作者款印。钤鉴藏印“于腾私印”“黔宁王子子孙永保之”“丁伯川鉴赏章”“□堂”等4方。

再如马远《白蔷薇图》，绢本，设色，纵26.2厘米，横25.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的白蔷薇花朵硕大，枝叶繁茂，光彩夺目。画家以细笔勾出花形，用白粉晕染花瓣，以深浅汁绿涂染枝叶，笔法严谨，一丝不苟，画风清丽活泼，颇具生气，代表了南宋画院花鸟画的典型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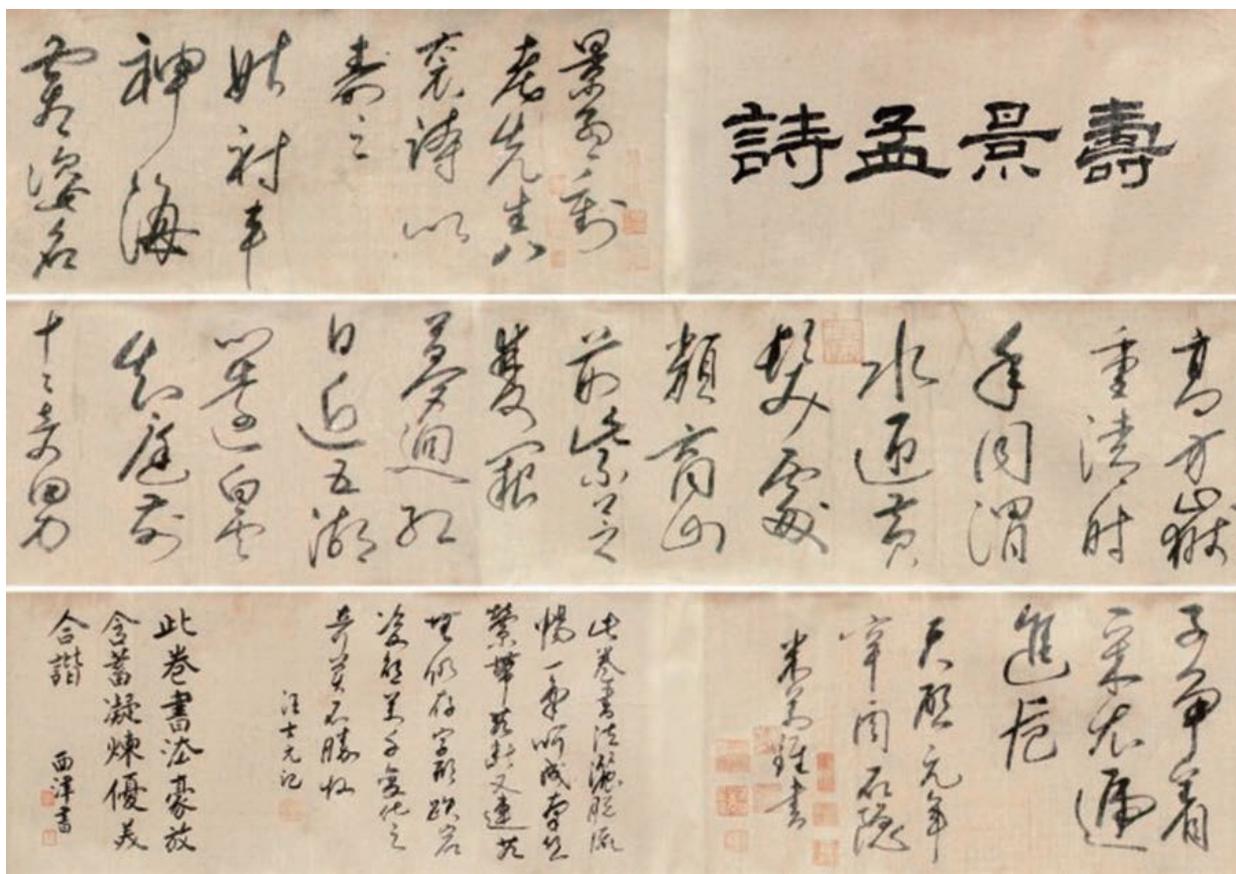
本幅款识：“马远”。钤鉴藏印“勤孝堂”“芳林鉴赏”“毅岷珍藏”“于腾私印”“丁伯川鉴赏章”“懋和真赏”“项子京家珍藏”“退密”“神品”等。

于腾打点官场不仅面面俱到，而且煞费心机。孝敬四川一把手丁宝桢的是神品，官员有品级，赠予字画的名头也就不一样了。由此可见晚清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

譬如他送给四川按察史方浚颐的则是明朝米万钟《刘景孟八十寿诗》。

方浚颐（1815—1889年），字子箴，号梦园，广东定远人。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进士。1869年任两淮盐运使。1876年任四川按察使，晚年居扬州主讲安定书院。收藏书画甚富，精鉴赏，颇负时名。

米万钟（1570—1628年），关中（今属陕西省）人。明代书画家。字友石，又字仲诏、子愿。居燕京（今北京）。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后裔。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二十四年授永宁令尹，官至太仆少卿。工翰墨，有好石之癖。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米万钟“行得南宫家法与华亭董太史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誉。尤擅署书，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世称米万钟、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书



《刘景孟八十寿诗》 明·米万钟

家”。

《刘景孟八十寿诗》是米万钟为景孟贺寿所书，长331厘米，高25厘米，约7.4平方尺。迎首有清末重臣端方“寿景孟诗”四字隶书。画心为贺寿诗句，用笔劲健丰润，提按分明，线条的组织与衔接极敏感，惯于一笔数字，贯气流畅，中途无怯滞生硬之感。点线盘曲纤环，体势沉着秀逸，多欹侧跌宕之姿，确有米字气派。曾参加拍卖，因底价太高，流拍。

该画钤鉴藏印“怡亲王宝”“芳林主人鉴赏”“卞令之鉴定”“曾藏潘氏海山仙馆”“飞卿过眼”“海虞邵氏珍藏金石书画之印”“曾在方梦园家”“嘉兴新丰乡人唐翰题收藏印”“端方私印”“莱臣心赏”“麟士”“向叔审定真迹”“曾藏荆门王氏处”等。“飞卿过眼”为于腾收藏章。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做地方官要有“护官符”。成都治下居住着许多达官贵族，身为知府的于腾岂敢慢待，不仅要通融，还要经常走动，这也是当年官场的潜规则。举个例子：于腾坐知县的宜宾，出过一个大官叫薛焕。薛焕（1815—1880年），字觐堂，出生于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古木湾，因其父与兴文县富安乡薛氏联宗通好，遂使薛焕入籍兴文县学，故相关史料皆称薛焕为兴文人。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二十九年选授江苏金山知县，后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历任松江知府，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旋以头品顶戴调任为通商事务大臣。进京后署礼部左侍郎，继改调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等。同治五年离职回川，期间在川办尊经书院并任第一任山长。回川后，于腾特地馈赠了一副清朝王原祁的《仿大痴山水》与他。

王原祁（1642—1715年），娄东画派代表人物。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江苏太仓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人称王司农。以画供奉内廷，

学元四家，以黄公望（号大痴道人）为宗，与王时敏、王鉴、王翬并称清初“四王”。

《仿大痴山水》是王原祁应其侄儿，当时的成都知府岷望（岷望即王瞻）之请而作。中国书画鉴定界当代泰斗张珩评价此画说：“王原祁为岷望仿大痴轴，此画用笔设色俱佳，丘壑亦胜”。此图轴122×55厘米，原藏上海博物馆。后经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价2185万元。

钤印“原祁之印”“麓台”“扫花庵”“石师道人”。鉴藏印：飞卿过眼、虚斋珍赏、枕经书屋主人次申章、醒斋欢喜。“枕经书屋”为薛焕第三子薛华培堂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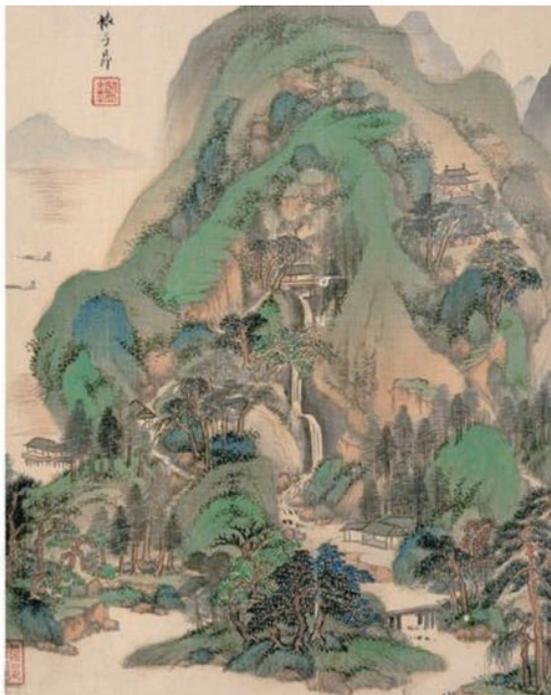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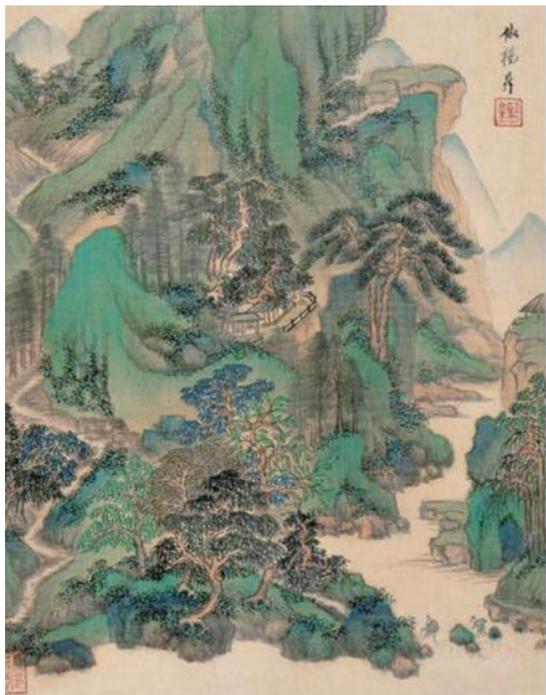
于腾故后，续弦王氏扶柩还乡，居住在沂州城，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时的兰山县令官本昂嗜古痴迷，他通过巧取豪夺攫取了不少于腾的遗存。官本昂，江苏泰州人，字子行，亦字紫珩，又字千里，室名延蝶仙馆，鉴藏家，道光至同治间人，在山东为官多年，光绪十四年曾任费县知县，光绪二十一年任兰山县令时。光绪谕旨：“兰山县知县官本昂，揣摩钻营，贪以致富。着即行革职。”

我们今天知道官本昂收藏一册清王鉴《仿古山水集册》。确实来自于腾家。王鉴（1598—1677年），明末清初画家，“四王”之一。字元照，一字圆照，号湘碧，又号香庵主，江南太仓人。王世贞曾孙。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后任廉州府知府，世称“王廉州”。工画，早年由董其昌亲自传授，董其昌向王鉴表示“学画唯多仿古人”“时从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见宋元诸名公墨迹”，与同族王时敏齐名，王时敏曾题王鉴画云：“廉州画出入宋元，士气作家俱备，一时鲜有敌手”。

该册画幅27×21厘米，绢本，共七幅，钤鉴藏印“古余珍赏、于腾之印、长卿珍秘、泰州官氏珍藏、金匱廉泉桐城吴芝



《仿大痴山水》 清·王原祁



《仿古山水集册》 清·王鉴

探索发现

瑛夫妇共欣赏之印、枫琊、蒋谷孙审定真迹、望云草堂珍藏、山左陈氏石樵珍藏、于腾、荐款葆采允弟之印”。“长卿珍秘”也是于腾的收藏印，该画2006年由嘉德四季第4期拍卖会拍出。

官氏藏画，去世后全部转予亲戚廉泉，后流往日本。这也是研究《研山铭》走向的一条线索。

于腾夫人王氏在沂州兴办义学，被朝廷诰封为“一品夫人”，并赐其金凤冠一顶，山东巡抚杨世骧亲赠“撒环兴学”牌匾，以示褒奖。从于腾的藏画的流向中，我们发现这些荣誉的背后还有其他故事。现藏大连天工艺术品收藏馆宋代曾云巢的《芳草春晖图》，原藏于皇城官中，流传有序，上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古稀天子”“寿”“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烟云无尽藏”等印。后经于腾收藏，钤有“飞卿过眼”收藏章，其后又重新回到了官中。被加盖了“宣统鉴赏”印章一枚，可以肯定此画的回归当于“撒环兴学”事件有关。

至于此画的价值，当为存世宋画中的重器，于腾收藏品中的花魁。元代书法家、文学家周伯琦借用唐人裴说之诗为本画题签说“数朵欲倾城，安同桃李荣，未尝贫处见，不似地中生，此物疑无价，当春独有名，游蜂与蝴蝶，来往自多情”，与画相得益彰，说得恰到好处。而于腾在此加盖印章的印文也相当讲究。



《芳草春晖图》 南宋·曾云巢

抗战旧址之

莒南大店

本 编

莒南县大店是鲁东南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镇。1941年3月至1945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曾长期驻扎在这里。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政府——山东省政府在这里诞生。

1943年8月12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在莒南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省战时行政委员会。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接受日寇的投降，即将出席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38名山东代表联名向省临时参议会和省行政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成立山东省政府。

8月1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在大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山东省政府，推选黎玉为省政府主席。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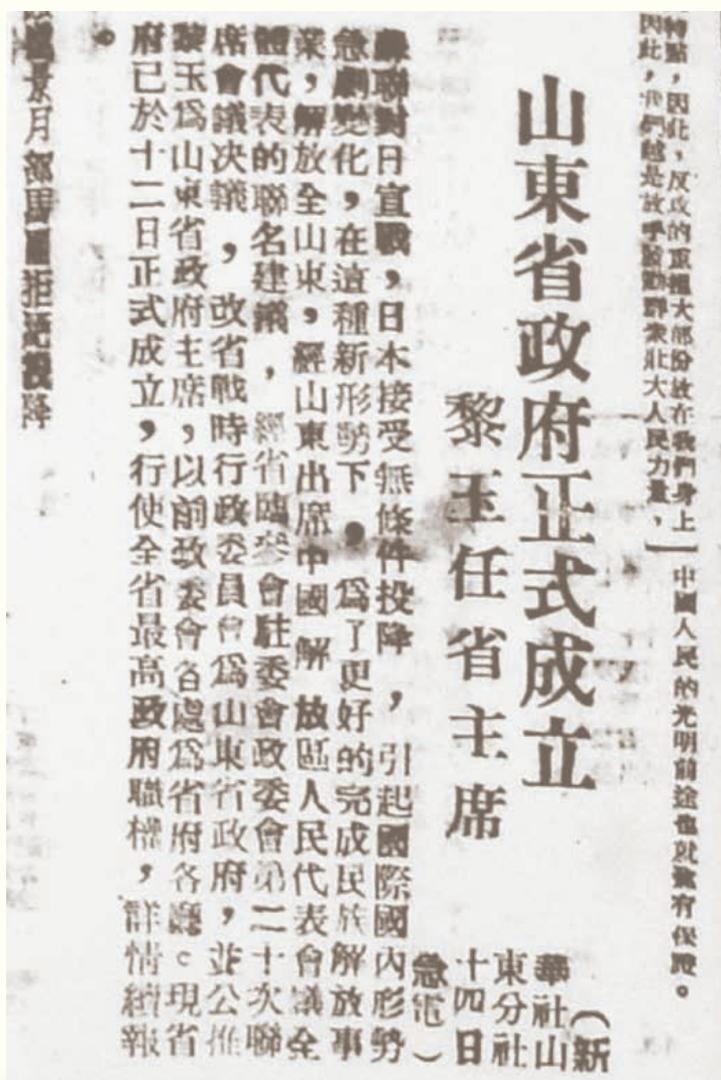


的第一个省级政府诞生了。当天，黎玉主席签发布告，昭告全省：山东省政府自即日起行使职权。第二天，大众日报刊发了题为《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黎玉任省主席》的新华社通稿。

8月22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省政府所属的七个厅局，推选刘居英任省政府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梁竹航任民政厅厅长，艾楚南任财政厅厅长，薛暮桥任实业厅厅长，杨希文代理教育厅厅长，黎玉兼任司法厅厅长，白备伍任卫生总局局长。

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和省政府旧址主要驻原大店庄氏庄园的两个显赫院落“四余堂”和“居业堂”。庄氏庄园是大店庄氏家族自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末，建起的群团式地主庄园，每个庄园都冠以不同的堂号，当时有七十二堂号之称。看到八路军真心抗日，时任县参议员的庄孝光和庄氏族长、镇长、居业堂主庄余珍主动将堂号献出。省政府成立之后，省政府的七个厅局和抗大一分校曾分别在八个堂号办公。

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暨山东省政府成立旧址，作为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红色丰碑”称号。



虚丘城遗址

平凡

虚丘城是一座春秋时期的古邑，位于费县新庄镇最南部的尹家岭村东南，蒙台公路西侧，靠近兰陵县边界。此处是以沙丘地貌为主的岭地。《费县文化志》称之为“尹家岭遗址”，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有夹砂灰陶绳纹鬲足、泥质灰陶瓦片盆沿等，文化堆积0.5米，但是破坏严重。

《左传·僖公元年》记载：“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戍将归者也。”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鲁僖公在偃邑（鲁邑，位于虚丘北侧，今属费县）打败了邾国的军队，这支队伍是戍守在虚丘将要返回的军队。

这个虚丘，究竟属于邾国，还是属于鲁国，史上存有争议。

东汉经学家服虔认为属于鲁国。他说：“虚丘，鲁邑。鲁有乱，邾使兵戍虚丘。鲁与邾无怨，因兵将还，要而败之，所以恶僖公也。”

西晋学者杜预则认为属于邾国。他说：“虚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还，齐人杀之，因戍虚丘，欲以侵鲁。公以义求齐，齐送姜氏之丧。邾人惧，乃归，故公要而败之。”

邾国，史称邾子国，是周代东方著名方国之一，建都于邾（今山东邹城境内）。

邾国是鲁国的附属国。从春秋初年开始，邾国与鲁国的关系就一直不睦。因为鲁国是周王室的同姓国，在周代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上，亦即所谓“周班”，有“鲁之班长”的说法。鉴于鲁国的地位高，影响大，又与邾国为近邻，邾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千方百计想要搞好与鲁国的关系。在春秋时期，邾国国君多次到鲁国结盟朝见，以结好于鲁。但是，鲁国为了扩展领土，经常加兵于邾。仅《左传》记载，短短的二百余年里，鲁国对邾国的入侵就达十几次之多，先后夺取了邾国大量的土地。邾有时也不示弱，经常与当时的强国如晋、齐、楚结交，求得保护，与鲁国对抗。

庆父作乱的时候，鲁国公子姬申曾经跑到邾国避难。这个姬申，就是后

来的鲁僖公。按说，鲁僖公对邾国应该没有多少恶感。邾国之所以在偃邑莫名其妙地被打，其实另有原因。

鲁庄公的夫人哀姜，是庆父的情人。庆父死后，哀姜知道大势已去，于是逃往邾国。哀姜的本意是希望自己的娘家齐国能为自己撑腰，没想到齐国国君齐桓公根本不买账。他知道哀姜与庆父把鲁国搞得乱七八糟，于是命令邾国把哀姜送到齐国，用毒药把哀姜害死，然后将尸体送回鲁国。

从当时情形分析来看，虚丘是邾邑，偃是鲁邑，两座城邑靠得很近。邾国看到鲁国有乱，偃邑空虚，就自作多情地派遣戍守邾邑的军队替鲁国戍守偃邑。邾国本是好意，鲁僖公却并不领情，亲自带兵攻打偃邑，打败了邾国军队，而邾国军队原本就打算撤回虚丘的。鲁僖公不是不知道邾国的好意，他是怪罪邾国收留哀姜，故意要给邾国一点颜色看看。

“虚丘”这一地名，也是很有讲究的。

虚，也作“虚”，读音xū。《说文解字》说：“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从尹家岭现有的面积100万平方米的遗址来看，的确称得上大丘。

《尔雅·释丘》《说文解字》等都将“丘”解释为高地。在先秦著作中，以《春秋》一书中带“丘”字的地名最多。这些丘地，绝大部分都是处在水泽之中，是水泽之中的高地。尹家岭遗址地处东沭河与西沭河的分水岭，虽然现在干旱的沙丘，但在古代很可能是水泽之中的高地。

王小古年谱 (续)

刘瑞轩

1982年 壬戌 68岁

1月，论文《浅谈花鸟画的意境》发表于1月14日《大众日报》。

春节，以作品《月季》《墨竹》《好鸟知人意》参加山东老国画家作品展。

春，作写意《墨牡丹》，并题诗：“红花绿叶太平常，未若春山淡着妆”。

作写意《墨牡丹》，题诗：“洛邑传千古，曹州又一家”。

作写意《墨牡丹》中堂，题诗：“草草挥来意更长，莫嫌狂怪画花人”。

作写意《墨牡丹》，题诗：“人爱依描墨牡丹，比之五彩更斑斓。”



为志廉作牡丹《赵粉》，作工笔《虞美人》。

作彩牡丹《魏紫姚黄》，题诗：“人尊牡丹为花王，牡丹花中无正黄”。

作大幅牡丹《葛巾玉版》，题诗二首：（一）“情生于爱绝于疑，半是姻缘半是痴。”（二）“珍同玉版十三行，艳史花中有一场”。

作彩牡丹大中堂，题诗：“草草挥来意更真，莫嫌狂怪画花人。”

作彩牡丹《八色牡丹》中堂，题诗：“白玉雕成洁若霜，掌花案似火龙章。”

作月下牡丹《千秋一片月》中堂，并题诗：“质璞昆山玉；风高太白楼。”作六尺《牡丹》大中堂（五个新品种），并题诗：“都是新品种，花师待命名。”

作《大桃园》轴，并题诗：“王母园中植大桃，神仙也爱寿龄高。……”

作行草联：“花似心灵美，心灵美似花。”

作魏碑联：“字字千金含正气，卷卷五彩绘宏图。”

作写意《牡丹花下戏双猫》，后发表于本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

作《红牡丹》中堂，并题诗。作巨幅《牡丹樱花》题诗：“挥笔情无限，邻邦友谊真。……”作《墨牡丹》轴，题诗：“人爱依描墨牡丹，比之五色更斑斓。……”

作《彩牡丹》（2朵）。

作《墨牡丹》，题诗：“赏花须早起，带露更多姿。……”

作《墨梅八哥》，题诗：“转眼光阴成老叟，喜能笔墨应人求。……”

作《墨梅》轴，题诗：“园里花开有定时，磅礴犹龙倚托天。……”

作《墨梅花》，题诗：“园里花开有定时，春风纸上不停吹。……”

作彩牡丹《娇容三变》，题诗：“画尽千娇态极妍，眼花缭乱牡丹田。……”

作《白梅》轴，题诗：“红梅笑白梅，说是无颜色。”

作彩牡丹《梦劳菏泽牡丹田》，并题诗。

作写意《牡丹鹤鹑》中堂，题曰：“安乐和平皆富贵，丰衣足食即神仙。……”作《墨牡丹》中堂，题诗：“代代朝朝画牡丹，古今同画不同看。……”

作彩牡丹《梨花雪》，题诗：“悄悄梨花院，飘飘雪满天。……”

作《墨牡丹》，题诗：“计来七上牡丹乡，一片辉煌似海洋。……”

作《墨牡丹》中堂，题诗：“听得传胪第一声，平明骑马入宫门。……”

作同干一株两种牡丹《叠罗红和胜云红》，步赵佶题牡丹诗原韵题诗一首：“胜云罗汉总南柯，一样观音宝座荷。……”

作写意《牡丹》大中堂，题诗：“晓风拂拂含深意，吹面轻轻似有心。……”

作写意牡丹《白凤凰》，题诗：“亲见花中白凤凰，传言方信不荒唐。……”

书楷书“牡丹”联“相传国色凭公认，普撒天香不自私。”

作写意彩牡丹《牡丹花下戏春雏》大中堂。

作写意彩牡丹《蓝田玉》中堂，题诗：“不娇不艳自天真，淡扫蛾眉别有神。……”

作彩牡丹《玉版》，题诗：“珍同玉版十三行，艳史花中有一场。……”

作彩牡丹《二乔·芙蓉三变》，题诗：“最难描处最天真，最是临风最有神。……”

作四尺大中堂《五色牡丹云上栽》（包括红、黄、蓝、绿、粉五色），题诗：“五色牡丹云上栽，人神携手逛天街。……”

作四尺大中堂《葡萄》，并题诗：“萧萧白发又新添，甲子从头倏七年。……”

作工笔《山茶花》，题诗：“生平夙愿去云南，闻说山茶胜牡丹。……”

作工笔《竹节海棠》，题诗，“乍从温室见阳光，叶少枝疏不健康。……”

为振洪作《墨牡丹》，题诗：“得风花起舞，带露叶低垂。……”

作写意《兰花》轴，题陈毅诗：“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

作《红白牡丹》中堂。为技工学校摄影老师刘清白作画一幅。

作写意《月下白梅》，题诗：“窗前最好种梅花，明月霄深影横斜。……”

3月19日，小古应邀去费县，给县委，县政府、县政协领导作画。由师专刘瑞轩去临沂邀请，由县府办公室副主任魏宝玉和文化馆叶连品陪同，在政协会议室作画，并通知县城书画爱好者前去观摩。

为县人大作大幅《八哥》，为县政协作大幅《牡丹》。为县长宋梅作《红白梅花》，为政协副主席尹昌祚作《芭蕉》，为宣传部长朱兆彬作《一唱雄鸡天下白》，为纪委副主任张采谟作《葡萄》，为宋光奎作《牡丹寿石》，为魏宝玉作《竹笋图》。给在场其他人画的还有《牡丹》《葡萄》《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共20多幅。

下午，又和魏宝玉、叶连品、张采谟等人商议成立县书画篆刻协会（于4月6日正式成立）。当晚，县领导宴请小古，瑞轩作陪，领导赠小古砚台一方作为酬谢。

3月下旬，小古带领20多名美术班学员，乘学校客车第八次赴菏泽园写生。师生安排吃住在赵天楼家。因牡丹花尚未开放，学生先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写生知识，然后再一起到牡丹园观摩牡丹发芽、长苞的情况。直到牡丹花开放时，才进行写生练习。

期间，小古被农业局王凤林、杨冠芬夫妇请到家中作画，并教杨冠芬画牡丹，费时数天。

写生结束返临沂后，学生加工整理写生画稿，举办了一次“牡丹画展。……”

初夏，为副省长李子超作《葡萄》轴，为济昌是作《猫捕雀》轴。

夏，作《红白梅花》，题诗：“红梅笑白梅，说是无颜色。……”作工笔《仙客来》，题诗：“仙客远从海上来，御寒冒雪自然开。……”

于济南南郊宾馆，作巨副《菊花》（2×1.5米），题曰：“菊花确有大如碗，培植功夫总在人。”作巨幅《槐花双燕》（2×1.5），并题长款。（以上二画发表于本年8月28日《大众日报》）作巨幅牡丹（2×4米），题李子超咏牡丹诗三首，其一曰：“朱英万亩竞相开，唐苑汉宫何道哉？白玉碧珠到处有，要看花海菏泽来。”（此画发表于《山东画报》1983年1期）

作彩牡丹《胜云、罗汉》，题诗：“胜云罗汉总南柯，一样观音宝座荷。……”

为杨廷谷作彩牡丹《合笼罌粟》，题诗：“瓣层薄薄似云绡，怒火高烧迹未消。……”

作工笔牡丹《豆绿·玉版》中堂，题诗：“岁岁看花人似海，都与豆绿最关情。……”

作人物画《钟馗》中堂。题诗：“俗传除夕日，神鬼都下界。……”

作写意《腊梅》轴，题诗：“风刀霜剑惯相侵，鹤子梅妻雅议林。……”作写意《墨梅》，题诗：“清平三首误平生，留得千秋历史评。”

作写意《墨梅》，题诗“稀奇古怪一枝梅，只为抒情信笔挥。……”

作彩牡丹《豆绿》。作《墨牡丹》，题诗：“万顷花如海，难寻淡着妆。……”作写意《白玫瑰》，题诗：“大花园里浴朝阳，玫瑰花开天地黄。……”作人物《太白醉归图》题诗：“谪仙才貌压三唐，走笔成诗我独

狂。……”作人物《钟馗》，题诗：“莫怪老夫太认真，老夫无事不生嗔。……”

为晓林书行草王之涣诗《登鹳雀楼》。

作写意牡丹《魏紫姚黄》，题诗：“樯舳灰飞双丽冷，江东空员二为名。……”

作写意《红梅》，题诗：“千年老干抽新芽，数朵寒梅放异香。……”为廷谷乡兄作《白菊》中堂，题廷谷自作诗：“秋风亭亭立，寒霜洁更白。……”

作《架上鸡》，题词：“昨日晚吃酒醉和衣而卧，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作《鸡上树》，题诗：“家居学府潦洼处，偏值今年雨水多。……”

作《鸡上树》，题诗：“许多农谚非迷信，岂只云霓判雨晴。……”

作小写意《豆绿玉版》，题诗：“岁岁看花人似海，都与豆绿最关情。……”

作写意《捉什么》（小猫）

为志皓作《彩牡丹》轴。

从3月到8月，为避免外界干扰，经常躲到临沂市第三招待所，为个人画展创作作品。

5月，临沂展览馆举办“临沂枣庄地区书法展览”，小古有作品入展。同月，作《老梅》，并题诗：“稀奇古怪一老梅。……”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作《百花图》，题诗：“百花争艳百花园，风雨安然四十年。……”

小古偕学生杜洪祥、李雪山到54898部队营房拥军，由宣传科长甘汉生接待。小古除作画外，又写“譬如登山”四个大字。事毕，共同合影数枚。

端午，为王文起画《钟馗》。

6月，为临沂行署黄子中作《仕女》画卷，黄写诗答谢：“佳作更喜逢盛世，泉城荷柳添新色。”

为公三书白居易《放言》诗一首。

6月13日，作《自叙吟》（共36行），简述一生坎坷经历，并抒发自己壮志：“不管甜与苦，画笔从未停。但为千秋业，尤争百世名。”

7月初，大专美术班结业，举办师生作品联展。小古创作《松柏长青》参展。

7月8日，收省委杨廷谷信，求小古为省委宣传部张子明、刘守朴等人作画。



7月21日，作《彩牡丹》，题诗：“牡丹花富贵，立意起何时。……”

7月22日，作《彩牡丹》，题诗：“牡丹人共爱，因而吾爱之。……”

8月1日，作《彩牡丹》，题诗：“我爱画牡丹，花期一瞬间。……”

8月4日，作彩牡丹《玉版》，题诗：“吾家清箱藏玉版，未曾轻易予人看。……”

8月5日，作彩牡丹《豆绿》，题诗：“游人千里挂云帆，豆绿花开一见难。……”

8月6日，作彩牡丹《葛巾》，题诗：“奇遇长园少，隐情惹恨多。……”

8月7日，作彩牡丹《姚黄》，题诗：“姚黄原自出山中，百卉从花独树风。……”

8月8日，作彩牡丹《御衣黄》，题诗：“天然花性喜阳光，多事丹青紫线装。……”

秋，作《红牡丹》册页。

作写意《大鸡》大中堂，题诗：“东方鸡报晓，万国总相闻。……”

为纪庆田作《墨芍药》，题诗：“折插春三月，分裸夏末旬。……”

为京剧名旦张兰玲艺友作《墨竹》轴，题曰：“板桥以六分半作书，余以六分半作画，书与画，盖同源也。”又作《墨牡丹》，题：“牡丹园里燕双飞”。

中秋节，为国霞、世曙结婚，作《大吉图》。

中秋后七日，为张兰玲作彩牡丹《朴素风光》。

秋，作写意《带露牡丹》，题诗：“赏花须早起，带露更多姿。”

作《粉红月季》，题诗：“法国姑娘来旅游，千媚百娇性温柔。”

8月11日。小古带初选作品153件，由管玉桥院长和吴兴沛等人陪同，到济南搞个人画展。这些作品包括牡丹102件，梅花4尺半开12件，其他作品35件，对联4副。

经省美协主席于希宁帮助筛选，个展终选作品113件。

8月21日至9月4日，由山东省美协和省美术馆联合主办的“王小古画展”在山东美术馆展出。省市领导高启云、李子超、宋英，美术界领导和画家于希宁、王企华、王天池、张彦青、于太昌、黑伯龙、魏启后、刘宝纯、崔辉、张登堂、秦胜洲、尹延新等到会表示祝贺，展览很成功，在泉城引起轰动。



山水（局部）

展后，美术界在美术馆又举行了座谈会，与会者对小古的花鸟画都给予很高评价。

《大众日报》于8月22日报道了画展的消息。28日又发表了于希宁的评论文章《雅俗共赏，引人入胜——王小古画展观后》，高度评价了这次画展。作品在济南展出后，又于10月巡回回到烟台、昌潍等地市展览。在济南为培俭作《牡丹》小中堂。

秋，为村山作《菊花》轴，题诗：“折插春三月，分棵夏末旬。”

9月5日，临沂展览馆举办“临沂地区职工书画展览”，小古有作品参展。

本月，市科委潘昌玉到小古画室为之拍工作照。

10月14日，到济南山东艺术学院报到。

因暂无住房，又返回临沂。

在山东艺术学院，为彭昭俊作《彩牡丹》一幅，又作《墨牡丹》，题诗：“武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于阳春作《月季》。

10月24日，王汝涛、刘瑞轩在人民饭店举行酒宴，为小古饯行。

为马世治书甲骨文唐诗王之涣《登鹳雀楼》。

10月，作《彩牡丹》，共十二朵，庆祝党的十二大召开，题诗：“红花十二朵，象征十二大。晓起迎朝阳，彩笔写心花。”

为临沂京剧团贾少林作《彩牡丹》中堂一件，《墨菊》中堂一件。

11月，应河南岳武穆庙约稿，寄去《大鹏鸟》中堂一幅，参加岳飞专题书画展。

冬，应邀到沂河宾馆作画，学生马世治、崔培鲁同去。作画几十幅。主要作品有：陈列于宾馆门厅、走廊、餐厅等公共场所的几幅大画。挂在门厅的横幅是《云中牡丹》，另一幅是《松柏八哥》，挂于餐厅的是4尺横幅山水《沂河大桥写生》，挂于走廊的4尺横幅有《荷花》《紫藤》《凌霄》《葡萄》《牡丹·樱花》《瓜架听虫声》等。竖幅有《牡丹》《墨竹》《公鸡》《大鹰》《雁》等。

为浙江商向前作《墨牡丹》，为晓林、秀珍作《白玫瑰》。

12月6日，猝发心肌梗死，入地区医院抢救。

12月18日，经省里来的专家治疗，病情好转。

12月19日，因便秘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

12月24日，追悼会在临沂教师进修学院大礼堂举行，到会有千余人，行署副专员高广田主持，省美协主席于希宁致悼词。对小古先生的国画成就和艺术教育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

会后，骨灰由亲友、学生护送到江苏灌南县城安葬，并立碑。墓表由张寿民书写。

(全文完)

抗战歌曲选—— 《辞别老婆去当兵》

本 编



1943年，了休（左）、艾力（右）摄于莒南县十字路镇

了休（1916—1985）原名廖湘彩，笔名何止了休、廖秋。福建永定人。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政治部文工团团员、股长，济南铁路局电务段段长、济南铁路局俱乐部主任、济南铁路工会宣传部副部长等。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歌曲。如《伪军兄弟快反正》（知侠词），在抗战末期十分流行，此曲曾获山东省文化协会一等奖。《把解放大旗插遍全中国》《我们亲爱的天才将领陈军长》（罗光、何止词）、《别埋怨我无情》（白刃词）、《整党建军》（王刚词）等，传唱较广。1951年他曾任山东省音乐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

辞别老婆去当兵

1=C $\frac{4}{4}$

刘 亮词
了 休曲

<p><u>1.</u> <u>3</u> <u>5</u> <u>5</u> <u>1̇ 2̇ 3̇ 1̇</u> 2̇</p> <p>1. 哥 儿 十 八 正 年 轻,</p> <p>2. 哥 儿 忙 把 老 婆 叫,</p> <p>3. <u>八 路 军</u> 保 护 根 据 地,</p> <p>4. <u>八 路 军</u> 同 志 千 千 万,</p> <p>5. 我 要 依 了 你 的 话,</p> <p>6. 哥 儿 说 了 真 情 话,</p>	<p> <u>1̇ 2̇ 3̇ 5̇</u> <u>2̇ 1̇ 6̇ 1̇</u> 5̇ - </p> <p>辞 别 老 婆 去 当 兵,</p> <p>有 句 话 儿 你 试 听,</p> <p>对 待 咱 们 有 恩 情,</p> <p>哪 个 不 是 老 百 姓,</p> <p>谁 不 骂 我 是 孬 种,</p> <p>老 婆 这 才 把 手 松,</p>
---	---

<p><u>6.</u> <u>5</u> <u>1̇ 6</u> <u>1̇ 2̇</u> 3̇</p> <p>1. 老 婆 一 把 忙 拉 住,</p> <p>2. 我 去 当 兵 打 鬼 子,</p> <p>3. <u>咱 们 的</u> 队 伍 咱 们 干,</p> <p>4. 我 今 当 兵 你 扯 腿,</p> <p>5. 东 邻 西 舍 全 笑 话,</p> <p>6. 全 庄 老 少 开 大 会,</p>	<p> <u>2̇ 3̇ 2̇ 1̇</u> <u>6 5</u> 1̇ - </p> <p>啰 啰 嗦 嗦 不 放 行。</p> <p>你 在 家 中 也 光 荣。</p> <p>我 不 当 兵 谁 当 兵?</p> <p>人 人 骂 你 糊 涂 虫!</p> <p>脸 蒙 狗 皮 也 难 撑。</p> <p>欢 送 哥 儿 奔 大 营。</p>
--	--



沂河桥的故事 (上)

本 编



民国时期的沂河老桥

临沂沂河老桥

沂河老桥亦称东洋桥，《续修临沂县志》中说：“城东关外沂河桥前系木板，民国二十三年春，中央筑台潍汽车路，改建石桥，工程颇大，宽一丈，长四里半强，通水仅六十余孔。国库发15万元，地方募捐3万元。二十三年春，范县长筑先督造，凡十阅月工竣，行人便之。惟中间码头过低，水涨易漫桥，无活板不能通舟，两边栏杆未备，行人诸多危险，亦工程师计划未周之咎也。”

1994年沂河洪水，沂河老桥垮塌为驿外断桥，不久便被拆除，从此完全消失，成为记忆。



1945年9月，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跨过沂河老桥，解放临沂城。



沂河老桥为连接临沂城与河东的主要通道，上世纪八十年代熙熙攘攘的人流。



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洪水冲垮的沂河老桥，衰落中帶有一丝凄凉。



曾子卒年考辨

李洪廷



《辞海》1979年版：“曾子（前505—前436），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但有关曾子卒年众说不一，现存四说，即公元前436年说、前435年说、前433年说与前432年说。

从现有征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详细地论证、讨论，我们认为后说（即前432）较确切。明李天植于万历二十三年（1596）作《曾志》，内有《曾子年谱》，定曾子生于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卒于周考王八年（前433年），年七十三。包大燿《圣门通考·卷六》考称：“制言篇（按：应为曾子立事）载：曾子之言曰‘七十未坏（原文为：七十而无德），微过可勉’，时必曾子七十以上始有是言，亦犹孔子七十而后有从心不逾之言也，然则曾子眉寿岂虚言哉。按悼公之丧孟敬子论食粥之礼，可见敬子请谥在悼公之后，其间曾子之病距此疑不甚远，于时计曾子之年当七十以上”。清王定安《宗圣志·卷三》载熊赐履《学统·正统》称曾子卒“时周考王五年，即鲁悼公三十二年，而卫敬公十五年也”，即应卒于前436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据《檀弓》，子夏设教西河而

丧明，曾子尚在。曾子卒当魏文侯十二年，亦近是。”魏文侯十二年即前435年。清冯云鹧《圣门十六子书·曾子书》称：“点娶上官氏，生曾子于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鲁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岁”“敬王三十九年，孔子谓以其志存孝道，作《孝经》授之，时年二十有四”“及孔子歿，年二十有六，学乃大成”“寢疾，孟敬子问之，召门弟子启手足，命元易箒，反席未安而歿，寿七十三岁”。这里冯云鹧记曾子之年与明包大燿“曾子之年当七十以上”说相合，且均以周年记之，“寿七十三”，亦即寿七十四岁（约公元前432年）无疑。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李启谦先生《孔门弟子研究·曾子》载：“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又称曾子。春秋末战国初年鲁国南武城人。生于公元前505年（比孔子小46岁），死于公元前432年。”

曾子晚年，著书立说得正以终。曾子自己说：“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即无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免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这同孔子“三十而立……七十不逾矩”之语十分相似，都是对过去的人生时光的总结与感悟。《颜氏家训·勉学篇》说：“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宋祁《宋景文笔记》解为“曾子年七十，文字始就，始能著书。”这里的“学”，应该是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的意思。曾子晚年始组织学生在他的指导下编写书籍。他们首先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起来，最后以子思为主编辑成《论语》。同时曾子认为自己也应有书，于是在乐正子春等学生协助下开始编写《曾子》一书，最后由乐正子春等定稿。他们还一起编写了《孝经》《大学》《主言》等书和篇章。有学者说曾子“卒于前436年”，时年在70岁就死了，如前所述，曾子大量的著书立说工作尚未完成，与其“七十乃学”“文字始就”“始能著书”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综上各家之言，以为清冯云鹧、今李启谦之说曾子“寿七十三岁”，即公元前432年寿终，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故《山东省志·曾子志》总纂亦从此说。临沂大学王汝涛教授《曾子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亦称“前432年，曾子逝世之年”。可以说，曾子逝世之年已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赵志全：新时代企业家的楷模

符丹 叶勇 陈海芸



鲁南医药集团董事长赵志全于2014年年底去世，他的事迹在当地引发强烈反响。27年间，赵志全把一个净资产不足2万元的校办小厂建成一个拥有净资产60亿元、年缴税8亿元，研发能力强、产品水平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制药集团公司。感人至深的是，赵志全在逝世前选定职业经理人为法人代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与改革精神。赵志全的事迹不仅回答了企业加速改革与发展的问題，而且还回答了企业为谁而办，利益为谁而谋，权力为谁而用的问题，回答了怎样把共产党员的政治核心作用与企业改革融为一炉。

苦干27年创造60亿元家业，弥留之际放权职业经理人

2014年11月14日深夜11点，赵志全批阅完最后一份关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文件时，却在猝然而至的呼吸骤停中晕厥在办公桌前。这一次，这位年仅58岁的企业家再也没能站起来。

鲁南的干部职工们都说，赵总是为了企业的发展过度操劳而死的。从2002

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到2014年撒手人寰，整整12年间，鲁南制药集团快速发展、新时代药业迅猛崛起，赵志全却在病魔阴影的笼罩下异常艰难地跋涉。

整理遗物时，人们在赵志全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他临终前留下的几份文件：一份公司人事任命书，一份提高职工待遇的计划书，一份科研项目的审批书。

在遗留下的人事任命书中，赵志全指定了新的领导班子，里面没有出现妻子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女儿的名字——这引起人们强烈的震惊。许多人对此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面对一手打下的江山，民营企业选择把企业经营权交给亲属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赵志全不仅甄选了新的法人代表，还坚决杜绝企业中的裙带关系。

1982年，赵志全从山东化工学院毕业后便进了当时的郑南制药厂。1987年10月25日，年仅31岁的赵志全一举中标担任厂长。当时这家制药厂账面上只有19万元净资产和2万元贷款，仓库原料仅能维持3天，人心涣散，濒临倒闭。甫一上任，赵志全就大力推行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三项改革，走上“以改革为动力”的发展道路。

1994年前后，现代企业制度刚刚提出，赵志全将企业改组为山东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当年11月进一步推行分配制度改革，按劳分配，摒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陋习。他的做法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当时，一位失去位置的干部，在胡搅蛮缠无效后，竟朝赵志全家的阳台开了一枪，以示恐吓与要挟。

27年间，从承包制的探索、三项制度改革、股份制的确立到弥留之际的公司运行体制的确立，一头青丝变白发，赵志全攻坚克难的改革豪情却丝毫未减。在他的带领下，如今已发展为净资产60亿元的大型综合性制药集团，2014年上缴税金8.2亿元。

不吝巨资斩获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不恋浮华蜗居老房20余载

赵志全生前审批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一个投资高达2亿元的生物制药科研项目。面对7%的科技投入，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么多资金投在科研上？赵志全的回答很简单：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只有深化企业改革、强化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才会有不竭活力。

鲁南制药集团的产品研发，经历从中药、西药到生物制药的综合发展。早在1989年，赵志全便与山东中医学院合作，开发出了国内首创并获得国际“金陵杯”金奖的新药“银黄口服液”，产品一炮打响，投产后年产值达3000万元。

1991年，氯唑沙宗项目的奠基揭开了鲁南制药中西药兼产的序幕。2002年，鲁南制药又扩建新时代药业子公司，步入生物制药的新阶段，从此鲁南制药集团成为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医药产业基地。

如今，在诸多科研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鲁南制药集团在科研创新上硕果累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省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20项、临沂市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100余项、获得授权的专利452项，授权专利数量居国内医药企业第二位……改革是鲁南制药集团科技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上述数字以不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环保是赵志全另一块始终坚守的阵地。2002年，在新时代药业建设初期，赵志全就力排众议，在环保方面立足高标准，投资3600万元建造污水处理中心，日处理污水3000吨，使污水达到淮河流域一级排放标准。2010年，他又投资1.8亿元，建成了万吨污水处理站，并通过“淮河流域污水治理项目”的环保验收。2005年，他专门招聘了1名博士、8名硕士，成立了“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中心”。

在赵志全遗留的文件中，有一份与员工息息相关：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在弥留之际，赵志全仍然惦记着给公司的员工们再涨一次工资。

当今企业的责任是什么？就是造福社会，让员工过上幸福生活！怎样当好共产党员？就是幸福在后，吃苦在前，让群众说共产党好——这是赵志全的直白理解。

谁也没有想到，沂蒙山区最大的企业家，竟然没有为自己置一套房产。赵志全之前的住所是一套使用面积仅40多平方米的旧房，客厅狭小逼仄，一张桌子摆下来，转身的空间都所剩无几。从1985年到2005年，他在这间旧房里住了20多年，而职工们都先后住上了一百多平米的新房。直到最后房子面临拆迁，他才和员工一起搬进了企业内部的新房。他先后6次放弃分房的机会，他说：“企业里职工最辛苦，好房子应该让他们先住；我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改自己”，以制度约束权力永葆企业活力

历经磨难的赵志全深知：企业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改自己，最重要的是建起一整套体制机制，用制度管住权力。在建制的过程中，有人说赵志全“六亲不认”，也有人反驳赵志全是先认“六亲”，他建立的制度首先卡住的，正是“六亲”。

在鲁南制药集团厚普公司提取车间工作的梁亚辉是赵志全的亲表弟。1997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鲁南制药厂，在车间一干就是18年。当时计算机专业的他还属于稀缺人才，再说有个亲表哥当厂长，他心想只要好好干，肯定有发展前途。谁承想连续四次参加物料、财务、审计等部门的招考，笔试、部门面试都通过，但最后就是过不了赵志全面试那一关。舅舅找到当厂长的外甥赵志全。赵志全笑着说：“我是总经理，我做啥，职工都看着呢。如果表弟进了重要部门有了实权，心里膨胀了，出点啥事，我怎么向老舅您交代啊？我这个当外甥的该怎么收场？药厂的制度就是亲戚不掌实权，这样大伙才能都清廉。”在这件事上，赵志全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如今，赵志全在公司工作的亲属中，没有一个人在公司担任中层以上的管理职务，甚至没有一个人在重要职能部门工作的！在别人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已经成为鲁南人习以为常的事实。“公生明，廉生威”，赵志全的以身作则，换取的是鲁南制药公正清廉的一片净土。

赵志全对自己要求异常严厉，然而对社会却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27年来，赵志全资助学生200多人，在扶危救困、捐资助学、打井修路、抗震救灾中踊跃捐款捐物，累计近亿元。

“做企业家，当如赵志全”。赵志全的离去，引发了人们对企业改革者的潮涌般的讨论。人们既看重他27年来在鲁南制药集团以改革激发活力、以科技创新形成竞争力、以市场营销形成影响力、以和谐文化形成凝聚力、以制度保障企业生命力的企业改革成功经验，人们更看重的是他把共产党员的核心作用与企业改革融为一体，展现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崇高精神世界，竖起一面当代优秀共产党员企业家的旗帜。

低调女高音

——记赵海燕

刘凤才

宋代普济曾有两句传世名言：“潭深波浪静，学广语声低。”这两句话用在赵海燕女士身上再恰当不过。在数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她端坐于笔者面前，表情平静如水，波澜不惊，没有丝毫夸张与张扬；说话款款而谈，和声细语，没有一句话的分贝能对听者的耳膜形成过度刺激，也没有激昂抑扬的节奏让听者拍案击节，即便是谈到最让她值得自豪和特别强调的事情，也是那么自然平和。总之，她给人的印象与感觉是不秀权威、不与听众的感觉“扳腕子叫劲”的人，恰如一位女低音歌唱家，相当低调、柔媪、深沉，然而穿透力与震撼力却很强。

波静因潭深，声低为学广。赵海燕这位语不惊人的“女低音”，在临沂市医学界特别是肿瘤治疗的专业领域中，却是担当领纲的“女高音”之一，其学识与成就，与其低调为人形成强大反差。她是临沂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兼肿瘤一科主任，CSCO会员，山东省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省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学分会委员、省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临沂市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放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从事肿瘤临床工作30余年，在肿瘤诊断、放疗、化疗及综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市较早地开展了“立体定向适形放疗”，明显地提高了治疗效果；特别是对头颈部、肺、乳腺、消化道等部位肿瘤的治疗均有相当的研究。她主持或参与多项医学科研项目，并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多项。而这样一位有影响力权威性的女专家，却保持着如此的低调，我想有三条使然：一是天性、性格，二是素质、养成，三是其从事的专业之难之不易。

低调女学生的高远志向

赵海燕是江苏邳州人，1957年出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顺利考入沂水医专。作为一名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大学生，她算不上活泼愉快的青春类型，也不是乐于出人头地的“善秀”一族，而是整天闷头苦读，刻苦认真地学习。老师和同学们很少听到她激情燃烧的豪言壮语，也看不到她张扬个性的夺目风采。不少人觉得这个女生很平淡无奇甚至是不是有点儿胸无大志，将来难以成为木秀于林的杏林奇葩，只是一个在同学通讯录上印上一个普通姓名的好学生、好同学罢了。

然而，赵海燕告诉笔者，她从少年时代就有自己的志向，只是觉得自己把奋斗志向特别是学习的具体榜样定得有点儿太高太大，有点儿“高攀”，一直“不好意思”公布于众，否则会被人家说自己吹牛。她的人生志向，是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有很大学问、对社会很有用的人。虽然那时做学问的目标指向还不固定与明确，但是她一直在心底追逐与“暗恋”着两个偶像：一是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居里夫人，二是著名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女士。考入医科学院、开始了医学生涯后，她心中的这两位偶像自然就更加亭亭玉立、光彩照人，一生中都在向她招手鼓劲，鼓励着她为人类健康而拼搏探索、不断进取的步子。

1981年，赵海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临沂地区人民医院。她本来想作一名外科大夫，用手术刀直接切除患者的病患与痛苦。但是，或者是领导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内向沉稳的性格，把她分配到了内科，从事血液病专业。至于后来，用她的话说，她是在市人民医院中最服从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也是变换专业最多的医生之一。最早从事血液专业，1984年又专门到青岛医学院进修血液专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一干就是十年。

正当她在血液专业上日臻成熟时，1993年，市院建立了肿瘤内科，从各科室抽调人员，领导又一眼看中了她，并任命她为肿瘤科副主任。理由是血液专业与肿瘤专业关系比其他专业联系更为密切，相关性更强。由轻车熟路到从头再来，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利益的一些牺牲，还要做出更大的付出，她当然有些不情愿。尽管如此，赵海燕没有在领导面前起高腔，强调理由，而是很低调地坚决服从了组织安排，踏上了新的道路。

当时的肿瘤内科是一个综合科，在治疗上是外科、化疗、放疗综合一体，专业细分不具体。为了提高治疗水平与效率，适应新的需要，特别是适应放疗技术的发展，领导决定把放疗专业独立出来。这个专业，她当时在学校时没有学习过，在治疗技术中，又属于难度最大技术最新的一块，集放射、物理、生物等技术于一体，既要学习新知识，又必须具备肿瘤专业的基础，医院中很少有人接触过，也很少有人具备这个条件。1999年，领导又把这个重担交给了赵海燕，专门派她到北京肿瘤

医院进修放疗一年。于是，她同样很低调地服从了组织安排。她想，这个专业必须有人干，为了病人，自己改变专业也在所不惜，无非像刘欢的那首著名的歌曲，让一切从头再来。于是，她又改变了具体专业，干上了放疗专业。当她学成归来后，担当了肿瘤放疗的大纲。学习与操作、理论与实践中间，毕竟有一段距离，她清楚地记得做第一例肿瘤病人化疗时遇到的困难，她提心吊胆，小心谨慎，终于完成了治疗。为了及时取得指导，她与北京的专家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并请他们经常到科里来，进行现场指导。在她的带领下，放疗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了治疗肿瘤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不断壮大，从开始时她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现在仅副主任医师就有五六名，都具有较高水准，能独挡一面。而她，也被提升为医院肿瘤科主任兼任肿瘤一科主任。

低调女大夫的高度水平

2000年，科里收治了一位已经60多岁的肝癌患者。当时病人不想受痛苦的折磨，主动要求放弃手术治疗。根据病人的情况，赵海燕决定对其进行精确放疗。在她的精心治疗下，病人的生命又渡过了12个春秋，直至2012年才溘然离世。这在肿瘤治疗中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与残酷吞噬人类健康与生命的“恶虎”之一。肿瘤治疗至今主要是三大技术，外科手术，化疗，放疗，还有几种疗法结合的综合治疗。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无论何种疗法，人们距离彻底战胜和消灭这一“恶虎群”的目标，仍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仍然在进行着百折不挠的努力与奋斗。对这种让人谈虎色变的疾患，除了敢于牛皮海口、信口雌黄的江湖野医，或者是毫无责任、天花乱坠的狂野广告，还没有人敢夸下海口，包打天下。赵海燕作为肿瘤诊治专业一名高度负责与态度严谨的专家，在谈及自己的专业成绩时，始终守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极少为自己取得的进展与成绩而沾沾自喜、喜形于色，却每每因一些患者由于不能最终获得生命的“完胜”“完善”“完美”而表现出一种无奈与惋惜。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在专业上的突出成就与重要影响。她的目标是，对肿瘤，能治愈当然最理想，如果确实难以做到，至少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尽可能延长患者生存期，二是尽最大努力减少患者病痛，提高生存质量。为此，她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开阔视野，引进新的技术，开展新项目。

2000年，科里开展了“适形化疗”。原来的普通放疗，都是将放射源大体照着占位性病变的形体，进行散发式照射，如同用鸟枪散弹打猎，放射面积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流弹和散弹，不但打了病灶，而且误伤了正常健康组织，对人体危害很大。而适形放疗，则是实施“精度打击”。对病变组织从前后左右、面积体积等几个方面，进行精确的计算，然后对放疗设备进行“精确制导”，对肿瘤进行“定点拔除”式治疗，只消灭敌人，防止了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当时，这项技术在全国肿瘤治疗中，也是属于比较先进的，市里虽然有治疗肿瘤的市级专科医院，也还没有开展，而市院肿瘤科运用这项技术在全市是首家。

在适形技术成熟后，赵海燕又开始向新的目标前进，引进了调强放疗技术。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技术，主要是针对肿瘤部位的深浅，分层次控制放疗的力度，类似于“深度打击”，在全国开展这项技术不过五六年时间。现在，她已经引进了设备，正在积极筹备在临床上应用。

引进新理念，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治疗效果大大提升，特别在治疗食管、肺部肿瘤等方面，她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预期的效果。

赵海燕说，对于晚期的恶性肿瘤患者，要延长其生存期，提高其生存质量，减少其痛苦，关键在于因人制宜，确定合理科学的治疗方案，实行个体化、综合性治疗。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不但要掌握肿瘤治疗知识，对各科的知识都必须掌握，不但要懂化疗放疗，更要把这些知识与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施治。同时，在进行放化疗中，必须严格地实行规范化操作，用药与放射量既不能不足、耽误了病情，也不能过度、使病人不能承受，或者造成对正常组织的损害。

2008年，赵海燕收治了一位50多岁的乳腺癌患者。患者已经进行过外科手术治疗，后来复发并转移为脑瘤，病情十分严重，预后很差，多数医生认为患者只能生存很短时间。赵海燕在对其肿瘤病变进行放疗、化疗的同时，结合进行内分泌治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患者至今生存。另有一位男性肺癌患者，手术后同样转移为脑瘤，很多人也同样认为他生存不了几天。但是经赵海燕综合治疗，其生存期延长了数年。一位70多岁的老夫人，4年前发现为肺癌后期时，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佳，手术后赵海燕为老人进行了靶向放疗结合化疗，为老人延长了四五年生存。有一位干部，2006年诊断患上了肾区淋巴瘤，尽管及时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预后也相当不好，转到肿瘤科后，在赵海燕的精心放疗下，现仍生存。所有这些，在过去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低调女专家的高尚医德

专家与权威的称谓，在业内圈子里，体现的是一种能力与水平，一般也总是给人以居高临下、一言九鼎、醍醐灌顶的师道尊严，让人们不仅产生崇敬，也产生着压力与距离。但在赵海燕惜墨如金的言谈中，有一句最最普通的话语，却表达了一名权威最奇特的思想观念，也最使我感动。在向她请教关于医患关系的见解与处理医患矛盾的锦囊妙计时，她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医生要向患者学习，把患者当老师，除了心存一片同情与关爱，更要尊重患者，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

她说的意思是，对患者首先要充满爱心、理解患者的心情，同时也要认真地倾听患者的倾诉，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病情。病人的病患轻有重，表达能力千差万别，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坐在医生面前特别是专家面前时，首先是期望医生高度重视他的病情，仔细地听他关于“不舒服”“很难受”的诉说，千万不要把他不当个“角儿”，千万不要把他的“严重情况”当成耳旁风，尽管他的主诉有时确实是小题大做，尽管他说的症状有时与真正的病因确实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能认真、耐心、仔细地倾听与询问，首先就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与关心，一下就拉近了医患间的距离，使患者得到了充分的人情温暖与精神安慰，再给予负责任的科学的解释与回答，患者的病情首先就减轻了三分。正所谓良言一句三春暖，和风一缕化寒冰。如果嫌弃患者的絮叨，漠然病人的情绪，甚至一个细微的不屑一顾的表情，立即就会让病人感到雪上加霜。更重要的一点，赵海燕说：“俗话说：‘病长在谁身上，谁最清楚其中的味道。’各种疾病，不论病因如何，但一般都是从各种症状上表现出来的；千百年来，医者也正是首先从各种症状上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分析总结各种疾病的。你不首先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怎么能够进行分析和判断？尤其是同一种病患，虽然在症状上有它的一般共同性，但成因的复杂、病情的轻重、个体的差异等，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细微的地方，又往往因人而异，表现得千差万别。医生如果不仔细地倾听病人的诉说，忽略了这些细微而不同的差别，怎么能因人制宜、准确及时地进行诊断和治疗？医生的临床经验、专家的独特见解、医术的创新改进，一般不是从人所共知、已有知识中得来的，恰

恰是因其敏感、认真、细致、耐心的态度，从对这些细微的、不同的症状中了解、认知、分析、判断中而得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患者诉说得越多、越详细、越是‘与众不同’，往往就是在给医生当‘老师’，在给我们‘上课’，让我们对某种病症得到新的更深入的认识。要当患者的好医生，首先要当患者的好学生，这不仅是良好的医德，也关系到医术，总之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病救人、为广大患者服务的根本目的。”

诊断疾病要认真细致地听取患者倾诉，治疗其疾病则要对其多多进行耐心科学的解释，得到病人及其亲属的理解与配合，这也是赵海燕的一条经验。肿瘤治疗，情况复杂，手段多样，医生要在精湛医术与高度负责精神结合的基础上，反复确定其治疗方案，同时，要对其亲属做出说明，征求其意见。不能“一言堂”，自己说了算。为了向人们宣传普及肿瘤预防与治疗的常识，赵海燕在门诊病房里广泛地印发了宣传小册子，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与掌握有关知识，这也是一种普及型的简捷有效的“解释”。

赵海燕的高尚医德，根本上来自她的一片仁心。她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也特别打动人心。她说：“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肿瘤患者，自己只所以这么用心、用功、用力地进行治疗，努力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就是为了满足所有老人都有的一个人生的最大愿望：儿孙满堂，几代同室。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第三代的老人，如果能延长一些他们的生存期，让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够实现自己抱上孙子的愿望，脸庞上露出最幸福的笑容，自己付出再多，心里也是热乎乎甜丝丝的，能有比做到这一点更有成就感的事业吗？”

低调，与高水平、高道德，在赵海燕的身上，体现了最完美的统一。





“我离不开舰炮”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志明

余华梁 黄 华



邱志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临沂人，1961年出生于兰陵县（原苍山县），现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技术少将。我国舰载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知名专家，长期从事舰艇作战系统、火力兼容、舰炮武器系统和舰载多武器兼容发射的论证、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制，创建了舰炮武器系统性能参数优化和配置优化模型与算法，主持完成舰炮武器系统应用工程和新型驱护舰火力兼容控制系统研制工程，突破了小口径反导舰炮超高速技术和舰载通用垂直发射技术，为我国舰载武器系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8项，获授权发明专利23项，出版专著7部，发表论文100余篇，领衔的科研团队获首届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奖。获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科协“求是”奖、中国发明创业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15年8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给邱志明记三等功。

2015年12月7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5年院士增选名单，邱志明新晋中国工程院院士。

21岁解决舰炮难题，29岁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32岁当研究室主任，36岁任研究所总工程师，46岁任研究所所长，海军十杰青年、全军第一届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如果只看邱志明的履历，觉得他“简直太顺了”。了解这履历背后故事的人则明白，邱志明“太不容易了”。

舰炮为什么只能发射200发左右炮弹——21岁时破解舰炮老大难问题

1982年，邱志明即将完成本科学业时到工厂进行毕业实习，看到我国舰艇的舰炮还处于人工、手动操作状态，就暗下决心，要尽自己最大努力使我国舰炮系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当时，他注意到某型舰炮在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遗留了一个“老大难”问题——该型舰炮发射200发左右炮弹后，输弹装置就发生断裂，失去连射能力。过去不少科研人员虽进行过苦心研究，但都无功而返，使其成为一个当时国内同行都不愿意碰的难题，也成为制约我海军舰炮武器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邱志明在关系到能否顺利毕业的节骨眼上，毅然将这一难题选择为自己的毕业设计课题。有人劝他：“这个课题难度大，有风险，短期内难有结果，搞不好还会直接影响你

毕业。”

搞科研哪能怕失败？邱志明不听劝告，连续奋战10个月，进行大量的分析和运算后，找到了问题所在，提出了改进的思路和技术方案，写出了《某型舰炮输弹簧断裂分析及提高弹簧寿命的技术方案》的论文，受到评委的充分肯定，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此时的邱志明，并不满足于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定要亲眼看到通过实践突破难题。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奔赴工厂进行改装试验。

在当时的条件下，邱志明只有一次试验机会，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技术改进后的舰炮从200发、500发、800发，一直打到近1000发，输弹簧都安然无恙。

邱志明成功了。

经过专家鉴定，这项成果“解决了长期遗留的输弹簧断裂问题，有效地提高了某型炮连续射击的技术性能，海军装备技术部已正式采纳并投入生产。”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被载入《当代中国》丛书“海军卷”——此刻的邱志明，才21岁。

舰炮能拦截反舰导弹吗——邱氏团队成果上了英国《简氏海军武器系统年鉴》

正当邱志明准备在舰炮科研领域大展青春宏志的时候，历史的时针已指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此时，世界新军事变革曙光初绽，精确制导武器向传统的“海战之神”——舰炮提出了严峻挑战。业内专家议论纷纷：现在导弹满天飞，舰炮海战之神的地位和作用彻底下降，在现代兵器的家族里，舰炮顶多算个看家用的打狗棍。

当时在海军工程大学任教的邱志明也在沉思：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舰炮承担的使命不断拓展，既要和海、对岸、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还要防空、反导。这就意味着，要用信息技术来让舰炮系统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直至使其能拦截导弹。

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虽然世界上高新技术武器不断发展，舰炮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但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舰炮是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于一体的综合体，也是当今世界装备量最大、使用最广的舰载武器之一。即使舰炮是打狗棍，也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变得硬邦邦！”

邱志明是言者，更是行者。1987年6月，他走下讲台，来到海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室，在过传义、朱锡斌、毛炳祥、舒长胜等一批火炮界知名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实实在在的舰炮论证和科研工作。

舰炮武器系统的优化，一直是舰炮界难以攻克的难题，刚刚步入工程研究实践的邱志明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倔强地瞄上了这座“标靶”。

从此，邱志明的生活开始与机房相伴。当时，研究所机房只有1台小型计算机，运行速度慢，各单位的科研人员按小时轮流上机。邱志明和同研究室的年轻人孟庆德一起，事先编好程序，白天上机运行验算，晚上加班推导修改。每天早早地来，争排第一个，带着冷馒头进机房，盯着屏幕看结果。傍晚机房清人锁门，赶巧还没算完，他们总是央求管理员宽限再宽限，可一“放闸”往往就是数个小时。

半年过去了，邱志明和他的战友一起进行了数万次的推演计算，最终创造性地解决了舰炮武器系统性能、参数的优化难题，奠定了我国舰炮武器系统总体性能、指标论证和参数优选等重要理论技术基础。该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短短几年内，邱志明参与或主持完成17项课题，其中有12项填补了国内空白，4项获奖。

自此，邱志明和他所在的团队一起，为让国产军舰的舰炮论证设计研究早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拼尽全力且成果丰硕。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论证并参与研制的某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在对反舰导弹的拦截试验中打出8发8中的好成绩，使我国舰炮武器系统一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2004年9月，英国《简氏海军武器系统年鉴》刊发了两张图片，一段旁白引起世界关注：对掠海导弹的攻击，美国海军4次3中，中国海军8次8中。

看着印刷精美的某型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的照片，回想成功之路的艰辛，邱志明感慨万端。

舰炮能不能打超音速导弹——为舰炮行业的发展前进破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古往今来，武器装备矛与盾的博弈与对抗一刻也没有停止。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战场的需求，反舰导弹在增大射程、提高速度、提高精度和提高抗干扰能力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攻击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近年来，大多数新研制的反舰导弹的飞行速度从过去的亚音速发展到2马赫，有些甚至达到3~4马赫，突防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加快发展拦截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超高射速小口径舰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的问题，变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当人们带着这份紧迫感和危机感，把目光聚焦到我国舰炮身上的时候，心中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国的小口径反导舰炮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往后再怎么发展才能拦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呢？用舰炮对抗如此先进的导弹简直是个神话。

难怪此时有人提出，将舰炮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地位由主战装备降为保障装备，放弃舰炮对抗导弹。

这是舰炮行业发展前进的巨大迷障。如何破障突围，作为该领域发展的领军人物，邱志明面临着一道难解的人生考题。

“面前没有路，我们就要趟条路。”面对生存危机，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团结一心，拼了！

在邱志明的统一指挥下，课题组兵分两路，一路外出调研，摸清部队需求和支撑舰炮武器系统发展的工业生产水平；一路封闭在家，查阅资料，推导建模仿真验证。

经过艰苦的调研、摸索、思考，邱志明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某近程反导舰炮武器

系统基础上，大幅提高小口径舰炮的射速，达到以快制快的效果。

这个思路一直是国内外火炮技术领域希望解决、但又鲜有人敢于尝试的难题。因此，邱志明的设想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业内引起强烈震动，各种质疑迎面扑来。

但邱志明以沂蒙汉子特有的刚毅和坚韧，不为所动，他主持研究所、工厂和军代表室联合组成的课题组成员进行多方案的论证和分析，反复研究和优化方案，进行仿真演示验证、计算机模装、参数优化和动力学计算分析，大胆设计，工厂按确定的技术方案进行试制加工和调试。

邱志明又成功了。这个课题组解决了10余个技术难题，攻克了3大关键技术，使舰炮性能指标实现了跨越式突破。这一成功标志着我国小口径火炮在提高射速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舰炮打导弹”。

舰载武器多了，作战效能为什么没有增强——什么制约战斗力就解决什么

一个科研团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他们具备持久的创新力。当人们惊叹于他们在舰炮领域发展取得成绩的时候，邱志明和他率领的团队早已把目光投向了更新的领域、更大的系统。

一次，邱志明和自己的前辈舒长胜、毛炳祥到部队做试验，听到有位舰长反映，现在很多新型舰船都配备了对空、对海、对陆、对潜等多种不同用途的新型武器系统。然而，舰载武器种类和数量增多后，作战效能却没能同比增强。

“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紧紧抓住这个问题。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答案越来越明晰。

原来，过去舰艇上的武器系统相对较少，人工判断、调度全舰火力即可满足需求。如今，高速、隐身、精确制导武器不断涌现，舰艇火力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杂，武器之间存在的射界重叠、火力交叉容易产生误射误伤。为保证舰艇自身和舰载武器使用的安全，舰艇很少实施多武器同时交叉使用，使全



舰武器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效能。

困扰部队作战的难题，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在舒长胜、毛炳祥等行业老一辈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邱志明带领他的团队持续奋斗、创新发展，在舰艇火力兼容控制技术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上砥砺前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承担了“新型驱护舰火力兼容自动控制系统”研制任务。

新事物的诞生总是伴着阵痛。舰炮、舰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深弹武器、鱼雷武器、电子战系统和直升机等武器间相对独立研制，上舰后要进行火力兼容自动控制，这涉及到很多工业部门，既有技术难题又有体制障碍，有时一个接口就要协调十几次，反复磨合。而接口协议确定后，需要建立模型，进行实时解算、实时控制。“当时的计算机速度慢，推算火力兼容的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就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邱志明的老所长舒长胜回忆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舰上试验，他们终于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然而，邱志明并没把获奖作为项目研究的终结，在解决单舰的火力兼容问题之后，他带领团队乘势而上。在舰艇编队内，各舰艇装载的舰炮、舰空导弹等武器的数量多达几十甚至上百，如何开展海上编队火力兼容自动控制系统研制、如何实现编队内武器系统的自动管理和兼容控制，等等，这些重大技术难题，又成了邱志明团队的攻关目标。他们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现已应用到海军新造的各型舰艇上，为提高海上舰艇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选院士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支撑

对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志明表示，多年来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各级组织的培养，离不开老师前辈和院士们的扶持，更离不开团队成员的努力和帮助。“逆境处，是老师和前辈帮我分析原因，理清思路，给我动力和信心；顺境时，也是他们提醒我不要得意忘形，要继续往前走。”

“我也要感谢自己赶上了这样的好时代。”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支撑。“正是由于赶上了海军装备更新换代大发展的好时期，自己才取得了一点成绩。”邱志明坦言。

在邱志明的团队中有一个理念：一个团队就是一条船。“尽管我是团队的带头人之一，但成绩和荣誉属于团队中的每个人。”在邱志明看来，当选院士绝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要更加谦虚谨慎，为中国海军装备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临沂市史志系统再创佳绩。3月2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了2015年度“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评选结果，临沂市史志系统收获丰硕，再创佳绩。《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册）、《费县志（1986—2010）》获优秀市县级志书奖，“智慧临沂”手机APP获优秀信息化建设成果奖，沂蒙革命根据地抗日图片展、《莒南抗日烽火》获优秀地情研究成果奖，《沂水县志》（康熙、道光版）获优秀旧志整理成果奖。

刘爱军同志听取临沂市史志工作汇报。3月30日，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听取了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关于史志工作的汇报。

刘爱军对临沂市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临沂市史志工作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认真落实省史志办的决策部署，扎实工作，主动作为，取得了丰硕成果，走在了全省前列。朱海涛同志作为全市史志工作带头人，点子多、路子广，十分善于借势借力，到任六年内推出90多部史志成果，在抗战研究、信息化建设、史志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成效显著，沂蒙史志官方微信、“智慧临沂”手机APP、《沂蒙史志》期刊等特色鲜明、影响力大，值得全省史志机构学习借鉴。在省里组织的“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评选中，临沂市史志办成为唯一一个获奖项目实现“全覆盖”的单位，数量也是全省第一，在全省带了好头。希望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劲头，深入贯彻落实省史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修志编鉴、方志馆建设“三全”目标任务，同时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临沂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具备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成果。

全市史志办主任工作会议召开。3月16日，全市史志办主任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交流2015年工作，安排部署2016年任务。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王伟光组长和李培林常务副组长对山东省史志工作的重要批示，王随莲副省长、赵爱华副市长对史志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省各市史志办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各县区史志办主任进行了交流发言。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强调，全市史志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山东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地方史志工作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不断推进全市地方史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湖南省邵阳市史志办来临沂市方志馆调研交流。3月3日，湖南省邵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刘琼一行四人来临沂市方志馆调研交流方志馆建设工作。

临沂市史志办副主任段洪一行3人3月上旬到菏泽市方志馆考察学习。

市史志办公室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省市领导批示精神。4月7日，市史志办党组召开专题会议，就学习贯彻落实领导批示精神做出部署。

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强调，省市各位领导的批示，是对我们工作成绩的认可肯定，更是对我们的鞭策与鼓舞，贯彻落实好各位领导的批示精神，是当前全市史志系统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充分利用临沂市情网、“沂蒙史志”微信平台 and “智慧临沂”APP软件

等载体平台，对省市领导的批示精神进行广泛宣传；在全市地方史志系统干部职工中开展贯彻落实省市领导批示精神集中学习活 动，把省市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传递给全市每一位史志工作者；要把学习领导的批示精神与做好各项工作相结合，主动加压，顽强拼搏，创新工作方法，积极主动作为，做好当前地方史志各项工作；要落实好“三个全面”工作目标，按要求全面完成市县区二轮修志任务，实现县区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全覆盖，不断加强方志馆建设，实现县区方志馆建设馆舍建设、馆藏种类数量全部达标。

全市地方史志部门和全体史志工作者，都要以省市领导的批示精神为动力，以更加团结、务实、创新的精神状态，全力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地方史志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前列。

东营市史志办主任杜金华一行10人4月中旬来临沂市考察交流史志工作。

各县区史志办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会议精神。3月下旬，各县区史志办相继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会议精神，传达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充分领会此次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2016年志书编纂、年鉴编辑、部门和乡镇志书指导、方志馆建设、网站建设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近日出版。该书由莒南县史志办编审李祥琨编著，分“光辉历程”“激情回忆”等十一部分，收录历史照片约200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石泉湖村的光辉历史。